

中國政治史

新華社出版

中國政治內幕



孫幣會不會發行 李（公樸）（聞一多）

之死 民盟主席張瀾 紡管會內幕 羅衡的

一封信 周佛海爲什麼不死 風流外交家顧

維鈞 青年黨及其他 馮玉祥爲何出國 轟

動全國的糧貸舞弊案 竊盜金磚案始末 第

三方面的苦悶 端納與西安事變 羅隆基舌

戰羣儒 孔門四傑 張學良致蔣主席一封未

公開的信 四川人與四川事 民社黨領袖張君勱 中共兩發言人 吳紹

樹盛極而衰 民社黨與國大 張羣出國求醫內幕 廣東省議長的逐鹿

和談怎樣失敗的 一易再易的中大校長 沈鈞儒與救國會 台灣二二八

事變真相 招商局國營始末 青年黨與少年中國學會

中國政治內幕

林天行編

第一輯

南華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國政治內幕

每冊實價國幣

編輯者

林天行

出版者

南華出版社

福州高節路

經售處

前鋒出版社

福州中正路

立達書店

福州東街

版權所有
必究

中國政治內幕目錄

- | | | |
|----|------------|----|
| 一 |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 一 |
| 二 | 胡適組黨之謎 | 五 |
| 三 | 蔣廷黻勢孤丟官 | 七 |
| 四 | 毛澤東的家庭 | 一一 |
| 五 | 宋子文的政治資本 | 一一 |
| 六 | 民主同盟內幕 | 一六 |
| 七 | 政治商談在上海 | 一九 |
| 八 | 和談外紀 | 二二 |
| 九 | 關於五人小組 | 二五 |
| 一〇 | 孫科與政協 | 二八 |
| 一一 | 非正式商談的前前後後 | 三〇 |
| 一二 | 好事多磨的國民大會 | 三三 |
| 一三 | 林世良之死 | 三六 |

一四 外交界登龍術

一五 馮玉祥的得意傑作

一六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

一七 司徒大使的苦悶

一八 軍人政治家黃紹雄

一九 緊張的一天

二〇 南京的外交圈

二一 飛虎隊創業內幕

二二 于右山紅變黑

二三 江亢虎和它的黨

二四 上海總工會改選的曲折

二五 中大教授的派系與鬥爭

二六 倒李運動內幕

二七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二八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三八

四二

四三

四九

五二

五五

五八

六〇

六三

六五

六九

七一

七四

七七

七九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一個外國記者寫下他見到蔣主席的第一個印象道：「這是一個空前強烈的個性人物！」他的觀察是正確的，蔣主席和其他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一樣，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他有個強到底，不妥協的氣概，當他對某一件事，有了成見，他就不再讓人發言，要改變他的意志是萬分困難的。因此，從各院部會首長到軍事領袖到他周圍少數的親信們，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可以在他面前說話。會有一個部長級的要人說：「當我的車子快到主席官邸，我的心就往下沈，因為我立刻意識到又要挨罵了。」所~~以~~年來高踞要津的~~人~~，除了必需的才具之外，還要有一副好脾氣。

蔣主席有過人的精力，~~他~~能够注意到極微細的事情，舉一個例，他每天很仔細的看中央日報，發現標題稍有問題，他的手諭就經由陳布雷先生飛下來了，因此主筆政的人無不兢兢業業以從事。在重慶時，他每天看新華日報，凡是新華日報所揭發所攻擊的對象，他都要查究；成爲文武官員最頭痛的事情。因此大家自保不暇，遑論有所獻替？

在元老中，吳稚暉先生，于院長和戴院長都應該是極少數可以「說話的」人們之列的，可是他們從來不說話，他們以主席的意見爲意見。

往往把何敬之將軍當作蔣主席的最親信的人，其實他的發言力量非常有限，即使在軍政部長任內，蔣主席很少付予他實際的權力，尤其是在部隊人事方面。至於馮煥章將軍白健生將軍，他

們是客卿地位，只能說些官冕堂皇的話，不能深談。

在過去政學系首領楊永泰時，蔣主席頗資顧問，楊氏死後，張羣院長繼之，雖邀寵信，可是發言的力量，畢竟要打一個折扣了。

宋子文先生有一個較強的個性，我們知道，他曾同蔣主席鬧過意見，當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的職權，偏重於純粹行政方面，政治上的重要性削弱到了最低限度。

真正保有發言權，能够影響蔣主席的，爲四陳：卽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四位先生。論關係，這四位陳先生都够得上。陳果夫和陳立夫兩氏，於蔣主席爲姪輩行，陳布雷氏於蔣主席爲姻戚世交，陳誠將軍自黃埔軍校任職迄今，追隨左右達二十三年，四陳之中，陳布雷氏以文學受知，其個性內歛，不願多所建白，其重要性不若三陳。

在黨、政、軍三方面，蔣主席親柄最多爲軍事，次之爲政治，黨務差不多悉委陳立夫陳果夫兩氏之手，兩氏富於組織才能，在「以黨治國」的國策下，他們的地位日臻重要。兩氏既保有對上的發言權，又控制了最高決策機關，和各級黨部，不久就取得了重要的行政權力，通過委員長侍從室，左右各級行政機構的人事。假如說，兩氏的權力有一個限度的話，正確一點說：兩氏在黨務方面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權力，在政治方面握有百分之四十弱的權力，惟有在軍事方面他們沒有置喙的餘地。

假如在三年以前我們說：「陳誠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自爲不經，事實上，蔣主席培養陳誠將軍作爲最重要的輔弼，足足有十二年了。

十年以來陳誠將軍一直爲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北伐以還，中國一向處於軍事擾攘之中，沒有一天釋過兵戈，蔣主席疲於征戰，很自然的要覓一個有力的臂膀，助他參贊戎機，臂劃政略；使他感覺失望的，就是早期識拔的一些親信幹部，一旦獲得高官厚爵，只對子女玉帛發生興趣，事業心早已泯滅無餘，使他不得不培養一個新人，於是這位保定八期短小精悍操持謹嚴足智多謀勇於自任的陳將軍就脫穎而出了。

陳將軍之受蔣主席的殊遇，遠要溯及統一兩廣之役任炮兵隊長，攻破惠州天險時；其後，北伐之役，德勝關之役，馮閩之役，都成爲陳將軍最好的考驗。近則要數到江西剿共之戰，經過幾次圍剿的失敗，當時國軍將領聽到剿共，莫不搖頭，由於共軍宣傳政策政治工作的奏效，弄得士無鬥志，形成望風而靡的一面倒局面。鄒隊駐在稍爲暴露一點的地方，下級幹部往往這樣說：「見鬼，還不撤退，紅軍來了，又得繳槍！」當時情況的嚴重可見一般。蔣主席勞神焦思到了極點，乃檄陳將軍十八軍入贛，居然改觀戰局，二十一年十八軍頭風出到十足，做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飽無不解，（當時共軍本錢有限，珍惜實力萬分，十八軍是唯一能同他打硬仗的隊伍，所以處處退讓）如此情形，蔣主席自然逾格垂青。陳將軍會先後爲民除害，解散雜牌軍五十二師和五十九師，弄得當時陳將軍兩個上司——剿共軍總司令劉峙比與何應欽氏以爲他擅自行動，不服從命令，先後以去就力爭，可是經蔣主席考驗結果，卒留陳氏而將劉何兩氏他調。陳十八軍原祇轄第十一師和十四兩個師，調到江西不過兩年，擴充到了五個師，宜樂中伏，除李延年的第九師去了大半外，十八軍覆沒者有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共三師，當時頗爲一般妒陳寵信的人們

快心，有些將領竟說：「陳辭修也有這末一天！因為他們聽飽蔣主席的罵聲，不覺幸災樂禍也。當時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密答蔣主席將十八軍五師三十一個團，縮編爲三師九個團，蔣主席以這個密呈示之，陳將軍垂涕而道，謂：「委座如不需要十八軍，請撤銷這個番號，何必三師九團？否則，悉憑鈞裁！」誰也料想不到蔣主席竟批示：予以擴編兩軍八個師！（番號爲十一師十四、四七、六七、七九、九九、合編爲第五軍十八軍）陳將軍一直成爲他的政敵，攻訐，以怨之府，亦以此爲始。

五次圍剿之役，東路軍蔣鼎文和南路軍陳濟棠因運用堡壘戰術失當，頗有損折，而陳將軍統率下的北路軍却未有差池，所以共軍西竄。蔣主席班師回京，每逢到將領去晉謁，輒說：「你們去向陳總指揮請教！」

爲了減少陳將軍的謗言，蔣主席更苦心孤詣的一面提高他的威望，辦全國性的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令陳將軍任教育長，表面上給予他副職，不予以正職，以減少攻訐目標：（爲廣州行營參謀長，武漢行營副主任，軍政部次長等）同時委以若干極重要的祕密任務：如全國炮兵總指揮，各中央軍分校主任，副主任並由他提名。抗戰爆發，更把他放在最易發展戰功的地方，如滬浙之役的左翼軍總司令，武漢保衛戰的總司令，遠征軍總司令等。當二十七年時，陳將軍身領十餘要職：政治部部长，青年團書記長，二個戰區長官司，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總司令……；

爲之駭然，可是，當時蔣主席正暗示何敬之以軍政部讓陳呢！

蔣主席之於陳將軍，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他是唯一可以同蔣主席「吵架」的人，說來也怪

，蔣主席烈火似的性格，不容任何人頂撞，只有陳將軍常同他吵得面紅耳赤，緊張萬分，結果往往還是蔣主席讓了步，說：「辭修，照你說的辦！」

大家都知道陳將軍控制全國十分之八的陸軍和全部海空軍嗎？你知道他掌握了青年團全部權力嗎？你知道他的勢力一直伸入行政和黨政而且佔了很大的比重嗎？那末你是不會懷疑他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了呢？

胡適組黨之謎

當胡適校長剛剛回國的時候，許多人傳說他要組黨。這個風傳到現在已經沈寢了。但是在暗底下仍然傳之甚盛。胡適是否組黨？成爲一個謎。我們不想猜這個謎底，因爲政治的事，說穿了便是互相的騙局，說得文雅些，也只是太虛幻境的門對子，——「假作真是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不過我們願意分析一番。

以胡適個人而論，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他最初辦「努力週報」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好人政府」的口號。這說明了他的作風。在「獨立評論」時期，風頭愈來愈健。尤以「知難行亦不易」的幾篇文章，和孫中山先生唱反調，使得名氣更爲揚溢。後來，在獨立評論常常寫文章的幾位先生，幾乎都以胡適「行政院」的部長們自命了。

以目前的時局而論，政府方面，爲要「還政於民」，總希望有幾個能爲政府所看中，而代表

「民」的黨派來接收，也未始沒有給他一個機會之意。這在「錦上添花」的作用上，自然是應有的文章了。在去年，已有過某名流受到政府的青睞，被暗示出來組黨，某名流考慮再三，終於却步。同時各種奇形怪狀的「黨」，也爭着出現。乃至「跳舞民主黨」便這樣地出現了。像胡適這樣的人，自然比「跳舞民主黨」擺得出來一點。

然而胡適在這樣形勢之下，必然不會有所舉動。他一定以極世故的姿態來觀察風色。雖然他也作過一任「大使」的官，至少，在他自己「竊比管樂」的目光看來，他還是一個「老處女」，不會輕易談嫁娶的。

胡適的爲人是最善於投機的。他是政治交易所裏的大「空頭」。他的「好人政府」是一個最空洞而最油滑的口號。當他艱努力過報，初談政治之時，許多北大學生都說他簡直是「萬能博士」。其實這種論調是最幼稚的。因爲在那時候，他已有「名教授」之稱，如若不談政治，最多不過「名教授」終老。惟有在那時候談談政治才是因利乘便，一本萬利的手法。他現在更進步了，更巧妙了。在表面上不拍政府的馬屁，但他却至公至正，悲天憫人地打電報給毛澤東叫共產黨放下武器學英國工黨，這不是妙極了麼？老實講，憑這一通電報，他便已經大大「值錢」，緩一步組黨，也就不妨了。再看他回國後所發表的言論，和應酬的態度，已經明白地露出「看風勢」的作風。

以「北大」而論，雖然現在已經不是蔡元培時代的情形，雖然有許多人已經或正或反，變成「羅家倫型」的，及「周作人型」的了，但畢竟還維持了一個「道統」。這「道統」拿現在更確

切的話講便是「派系」。稍有幾歲年紀的人，總該還記得「北大」曾經爲了保全「北京大學」四字，作過最頑強奮鬥的一段怪事。在普通人看來，這是幼稚的笑談。但在他們，却象徵了一個堅強道統的建立。胡適仍然守住了這一個山寨，——若以胡校長的筆法，便應該叫做「北大店」吧！——勢力就夠了。好在最高的希望也不過行政院長。

蔣廷黻勢孤丟官

行總署長蔣廷黻的被迫辭職，正和他當時長救濟總署一樣也不偶然。要明瞭內幕情形，不能追溯一下他早年的政治生活和背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時，蔣氏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演「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史」，報章雜誌上經常發表獨到的政見文章。於是和當時的當權者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因翁文灝氏向委員長極力推薦才正式出山，担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之職，在職期間更得到孔祥熙氏的賞識，奠定了蔣氏政治基礎。十餘年來周旋於孔翁兩人之間，一九三六年出使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因有反蘇嫌疑召回，仍任政務處長兼行政院秘書長，隨着蘇聯態度的轉變，正合了蔣氏的論調，因此更受委員長的器重。一九四三年春羅斯福在大西洋城召開國際善後救濟會議（當時還沒有組織聯總）蔣氏被派以全權代表名義參加。回國後，即兼任善後救濟設計委員會主席，開始了他和善後救濟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美京華盛頓成立，中國代表一席，自然非蔣莫屬。年底回國後，根據聯總國際協會和

當時當權者的支持，極力籌組與聯總有關之善後救濟機構。定名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行總正式誕生，蔣氏担任第一屆署長，這是蔣氏一手造成的產物，認為以後可以獨當一面，放胆幹去，以完成他政治上的理想。

誰知好景不常，行政院改組，孔夫宋來，蔣氏失了靠山，不過蔣想事在人為，憑了自己的能力和學問，再加上有直接謁見委員長及與經濟部長翁文灝文字之交的優越條件，還是大有可為，可是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書本上查不出的「頂頭上司」的重要性，沒有好好聯絡，因此蔣氏便成了沒有上司的外交家。宋呢？原是有名的理財家，一登台自然理財第一。然而國庫支絀是事實，一看行總是個不要本錢的大宗買賣，怎肯疏忽，按例說，是應用個皇親國戚才能指揮如意，然而蔣有督謁委座的特權，而且和當朝人物也左右逢源，不便立刻下手，於是驀背看書般的走着瞧吧。

T V和T F就在互相的猜忌情形下各幹各的，好在外國物資還沒有來，更不必為這塊空招牌有失官體。這其間宋院長忙著新政，釘牢黃金外匯，蔣則出席了聯總第二次大會，深感學而有用，莊嚴地擬訂了中國善後救濟計劃。爆竹一聲，帶來了勝利，五億美元的聯總物資，果然如宋將預料地源源而來，這一下，行總的紙招牌可成了金招牌了，蔣立刻將行總搬到上海，大有趨而避之之勢。

去年九月起，行總業務正式展開，租輪船租倉庫還得行到政院通過給予四千三百二十億的金金，（佔全國全年稅收百分之五十二）雖然結果是一紙空頭支票，然而心理上總還暫時樂上一樂

；當時的蔣氏抱着兩個宗旨：一、力求聯總物資大量接濟。二、以忠誠穩健態度完成救濟工作。TV 一看情形不對，行總既然是行政院機構的一部，豈能獨自清高撇下國庫支黽不管，想來想去，想出個外國辦法，署長之外再加上一個執行長，共同向行政院負責，執行長人選決定了劉鴻生氏，劉和宋原是聖約翰同學，很有點交情。還有一層，劉是蔣請來當上海分署署長的，由劉兼任執行長，蔣似乎也無話可說。一道指令送到行總，這不啻給蔣當頭一棒，打破了大權獨攬的局面，蔣氏氣忿不過，想出最後一着棋，懷着一腔怨氣飛到重慶面謁主席，自請辭職，他說執行長在中國史無前例，這套外國戲在中國走不通，當然求賢若渴的蔣主席不會放他走的，於是百般慰留，保證雖設執行長，對內外仍由他全權負責。蔣出了這口怨氣，飛回上海，然而這有名無實的執行長多少有點制肘，劉和蔣是朋友和宋更是知交，敦厚多財的劉氏，處在兩大之間，很傷腦筋，政府命令不能不服從，執行長也不能不幹，然而蔣宋衝突時怎麼辦？聰明的辦法當然就宋屈蔣了。這其間行總發生了最大的困難，每月開支數百億而收入毫無，尤其是中央銀行老板由友好俞鴻鈞換了素沒平生的貝祖貽，這四千三百二十億的空頭支票，自然無從抵押，於是經費方面，無法籌集，眼看滿坑滿谷的聯總物資無法處理，這可逼得他走頭無路：五月間宋看準了這個弱點，利用時機，來了套杯酒釋兵權，客客氣氣請蔣和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到南京去談判，結果蔣交出了財務、分配、儲運三廳給劉鴻生；自己保留了有名無實的賑恤廳和工礦漁農衛生等委員會，道地的善後和救濟工作，而物資則全部轉移到劉的手里去了；相對的條件，好像是取得中央銀行的借款，實際上有人想由多財善賈的劉先生來處理物資，撥一個另頭也可維持行總職員的新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就是聯總宣佈對華停運令，蔣這一驚不小，立刻進京拜謁宋院長，不想遭了擋駕，再急急忙忙去看馬歇爾，才真相大明，原來自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辭職後，宋輕信會爲行總開除，而用作刺探物資情形之高級祕書奧姆斯克之言，將聯總署長賴瓜底前聘用雷氏繼任中國分署署長的徵詢書原書擋回，一面聯總中國分署三百餘職員爲聲援雷氏而向聯總控告行總工作不力，蔣氏至此，似已忍無可忍，頓萌去意，對宋之態度亦轉強硬。宋院長一向的作風，最恨人家在他意思下加一個「不」字，尤其是像蔣這樣可以直接見主席見馬歇爾的人，停運的恐怖總算在蔣的又硬又軟的外交手腕下挽回過來，但行總的工作則因交通阻梗，港口壅塞，加上政治黨派之爭，飽受攻擊，他想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做法是有意破壞國際條約，他辛辛苦苦出國五次訂立的「聯總國際協定」、「聯總大會決議案」、「中國與聯總間之基本協定」，他想用這三種大法來維持國際關係，現在呢？什麼都完了！

九月五日行總在京召開工作檢討會議，他抓住這個機會，在部會長官的面前宣讀了長三十餘頁的演講稿，他指出是誰在阻礙善後救濟工作，是誰破壞了國際條約，聽的人都呆了，蔣泰然地回到上海，有人警告他說，這會引起不良的反應，蔣說這反應是我預期着的，報紙上披露了蔣的辭職消息，蔣不承認也不否認，然而蔣宋衝突的尖銳化，已成了不可諱言的事實，於是，反應來了，九月三十號的下午，蔣接到宋的一個電報，說有要事相商，當晚他到了南京，宋很客氣的說：「蔣先生年來太辛苦了，行總的工作愈來愈困難，蔣先生該可以休息一會了！」蔣和氣地接受了這個要求，於是，行總的主人換了不知名的霍實樹了。

毛澤東的家庭

毛澤東的家庭相當龐大，正如共產黨「化整爲零」的游擊戰術一般。他的「寶眷」們散住各地；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以延安爲中心，他向四方建立了一幅輻射式的家庭圖案畫。這些輻射式的家庭圖案的單元，向心力的強弱也並不一致：換句話說，他家庭中每一個份子和他的關係，不見得完全相同；有的如膠似漆，有的藕斷絲連，有的異地同心，有的則完全不通音訊。

據現在我們所知，他有三個夫人，四個兒女，第一個叫楊開華，第二個叫賀志健，第三個叫江青——也就是電影明星藍蘋。

楊開華和他結婚最早，遠在他長沙求學時代。她有三個兒子，長子已三十多歲，次子也有二十五歲左右，都是在蘇聯念書，在民國二十四年，毛澤東率領紅軍開始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他們倆弟兄就離開父母到蘇聯去的。的確，當時他們祇有十幾歲，要一同參加長途跋涉，自然是力不能勝任。他們生活在異國情調中已有十年了，他們是在西伯利亞的風沙中生長的。

現在，毛氏又於工作之餘暇，享受着一個新的天倫生活，一個個子很高的毛揚湖（楊開華次子），在十年後的一天，忽然穿着黑色的長靴（俄國式）和羊毛衣服，從一架俄羅斯式的運輸機上，踏入闊別已久的中國土地；投到延安的懷抱。

延安——這充滿泥土氣息和藍色布衣服的城市，對這奇裝異服不速之客投出了詫異的眼光。而他，對於這原始的社會也感到陌生。他的回來，給他父親一個很大的安慰。那時毛澤東爲幾個月過份沉重緊張的工作所壓累，身體和精神都有點疲乏，不大舒服。有一晚，在一個跳舞會上：人很多，相當熱鬧；幾乎所有的黨政領袖都參加了；座中還有俄國人和延安訪問團的美國人；毛揚湖愉快的踏着俄國式的狐步，毛澤東也在悠揚的旋律中，不時起舞，舞影婆娑，舞級很好。

毛揚湖的俄國話相當流利，英語也很不錯；人家問他爲什麼回來？他說：「在中國歷史面臨危機的日子裏我要永遠留在父親的身邊」。這回答簡單而使人滿意。楊開華還有第三個兒子，當他們長征經過貴州時，帶不了，就在當地一個村落，交給一個農婦撫養；毛澤東到延安後殷念不已，派了很多人去訪尋，可是始終沒有一絲線索。

毛澤東的第二位夫人——賀志健，是江西人；是和他一塊兒歷千山涉萬水，在長征的隊伍中同路到延安的。沒有好久，毛澤東把她送到蘇聯去「深造」。

抗戰初起時，延安是一個理想的樂園；它給男女青年以美麗的憧憬。奇怪的是，上海有一個電影女明星也慕名而去；到延安後和毛澤東一見鍾情，便聊聊我，談起戀愛來了。這個女明星就是會和唐納同居，在上海鬧得滿城風雨的藍蘋，也就是毛澤東現在的太太江青。

前年十一月，江青因爲牙痛，（有人說，因爲賀志健從蘇聯回來，和她吵了嘴——事實待考）和周恩來同機到重慶。在重慶，江青成了一個紅人，來訪問者很多。（她有一個六歲的女孩還留在延安）她服飾樸素，態度大方，年紀還不大老，瓜子臉，相當媚人。

在重慶出席了很多的歡迎會，並且還有詩歌朗誦的表現；據說最近還有某電影公司請她重行出山，拍攝影片呢！

江青是一個有點英雄主義思想的人：她對任何人都這麼表示，她很喜歡延安。

宋子文的政治資本

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早已超過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他享有很大的權力，除了蔣委員長兼任院長的時候外，從沒有宋那麼大的權力。他像白宮中美國總統那樣，在內閣閣議（行政院院會）時總是坐着說話，而其他閣員（部長）都必須站起來發表他們的意見。他控制着各部的預算，這就等於間接地控制着他們的工作。他重新掌握他會一度失去的中國銀行，他經由貝總裁的手又掌握着中央銀行，他對黃金外匯以至證券交易所等比較次要的金融問題，都直接發號施令，決定政策。他經由徐堪部長控制了糧食，經由中紡公司控制了衣料，經由劉攻芸局長控制了敵偽的物資，並經由劉鴻生執行長控制了善後救濟的物資。他的經濟力量伸張到進出口和其他事業。在他直接指揮之下，成立了「最高經濟委員會」，控制全國經濟的機構。至少就經濟而言，他的權力是十分鉅大的。不但如此，他是得着蔣主席的充分支持的。過去蔣宋之間雖然會有許多誤會，但自孔氏在中外輿論攻擊下下台以後，蔣宋之間的關係却顯得密切和友好了。在蔣主席無條件支持之下，是有恃無恐的。他可以拒絕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參政會的邀請，不出席作口

頭的報告。他可以忽視黨內黨外的輿論，推行他所認為應推行的政策。除了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外，那一個行政院長會有過他這麼大的權力？

他的權方雖大，但也不是沒有限制的。他不能過問軍事，在軍事方面他是尊重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的意見的。他也沒有過問國共的政治商談，除了最近他曾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外，他對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是完全不過問的。記得去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陪都開會時，他除了爲歡迎馬歇爾將軍一度返渝外，全部時間都在收復區工作。他的興趣似乎是集中於經濟，所以自從國府還都南京後，他在上海的時間超過他在南京的時間。因此對於宋院長的活動，住在上海的人或較住在首都的人爲親切。所以在南京觀察對宋院長一年多的工作成績，其實南京的消息或者反不如上海那麼迅速與準確。因爲宋院長與其說是屬於南京的，毋寧說是屬於上海的。

宋氏是在日本請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時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對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後，却來了一連串的引入反感的措施。當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錯誤的設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會減低了他的聲譽。

在各種引起反感的設施中，下列幾點是比較嚴重的：第一是黃金存款強迫捐獻四成。存戶應否捐獻，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宋院長的辦法是使贊成存戶捐獻的人，也承認有兩個毛病：（一）這個辦法不公平。因爲在別的人沒有捐獻時，單獨強迫存戶捐獻是不公平的，在存戶本身，一兩的存戶不要捐獻而二兩的便要捐，也不能算是公平。（二）最嚴重的是這個辦法使政府喪失信用。孔祥熙氏的十多年的財政部長，雖然重槓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也有一個——事實上恐也

只有這一個——收穫。他的收穫是替國家樹立了信用：在過去十幾年中，凡政府在財政方面所答允的事，政府都是百分之百兌現的。甚至在抗戰初期，政府爲着維持信用，還歸還了不少的錢給日本呢！這種經十幾年才樹立起來的信譽，宋院長輕輕地便把它毀滅了。第二是把偽鈔折換法幣比率定爲二百比一，這等於對收復區來一個突然的通貨膨脹，使整個中層階級都受到嚴重的打擊，使收復區的物價，不能不作跳躍式的上漲。在這個比率決定以前，陪都各報對這個問題都不主張定在二百比一（據說伍啓元氏主張定在一百比一，谷春帆氏主張定在五十比一，沒有人主張定在二百比一），而宋院長決定二百比一的比率。這個比率的後果，大家都很明瞭，用不着我們多說了。第三是接收偽敵物資時的種種不法行爲。這雖不是宋院長所能負責，但他既是院長，則也免不了要受批評。第四是壓低公務人員待遇，而對公務人員提高待遇的要求，缺乏同情的考慮。這會引起立法、監察、司法三院的聯合攻擊。第五是對民族工業者缺乏同情的援助，結果引起民族工業者的公開的攻擊。第六是對金融界也沒有多大的同情，六月底金融潮中便有不少的人對宋院長有不滿的怨言。第七是對出口業缺乏及時和有效的援助。宋院長從來對農工是沒有關係的。過去宋的主要支持者出自中層階級、公務人員、購買公債和黃金存款的儲蓄者、民族工商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等。但在短短一年間，宋院長把所有這些人都開罪了。就目前的中國而言，宋氏的聲譽真是一落千丈了。

許多批評宋子文的人，常謂宋無政策。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宋自始至終，對國家財政經濟有一貫的看法，有一貫的政策。宋的看法有二：爲今日中國基本問題爲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之

原因在通貨膨脹，在財政收支失衡，在物資缺乏。二爲今日中國工業過於幼稚，不足重視，而商業與金融亦然。基於前一種看法，宋有三個基本政策：一爲財政收入愈多愈好；二、爲財政支出愈小愈好；三爲物資供給愈多愈好。他的費金捐獻政策，他的許多開罪工商界的政策，都是第一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二百比一的比率，他的壓低公教人員待遇的政策，他對農工商出口金融等業缺乏援助，都是第二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低外匯政策，他聽任外貨傾銷，都是第三個基本政策的結果。由於他輕視工商業的看法，他對工商業界的責難，是不予重視的。

上述的政策，是宋子文做行政院長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是否正確，見智見仁，各有不同。在政治上，他原有三種資本：一是美國人的交誼，一是蔣主席的支持，一是他自己的強大金融商業集團。不久以前，各方盛傳他因爲要加強自己的地位，可能與某集團發生密切的合作，但事實的證明，他把行政院長辭掉了。

民主同盟內幕

有人說，梁漱溟先生已經「厭世」，張君勱先生快要作「會琦第二」，民盟內部已呈分裂之象，危機四伏，正是崩潰的前夜。而且還有人舉出沈鈞儒先生打算另組「人民救國黨」，預備一跳出盟。章伯鈞先生要在短期內堅起「民主勞動黨」的大旗，自成一家，黃炎培先生自以私人名義致函中共後，外間就說「民主救國會」已使他與民盟若即若離了。那麼，民盟的內部是否就要

同床異夢？各行各素？使得民主同盟完全分裂呢？

根據民盟負責人的談話，再從各方面的詳談研究一番，得到的答覆是：「民盟不會分裂！」張君勳先生被邀請「出山」和他所領導的政黨改組，固然是被稱為「民盟分裂」的焦點，而人民救國黨，民主勞動黨和民主建國會，大旗開張，因此認為各自為政是不是對呢？梁漱溟先生對於外間的謠言，起初不予評論，後來他不能不說出：「民盟」的全名本來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既然是各政團的同盟，那麼盟里就沒有抹殺各單位本身的存在。所以張君勳，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氏各自所領導的政團進行改組，是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

旁觀者認為維隆基先生是民盟的基本演員。這次醞釀分裂，羅氏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理由是說他的意見太多，和黨內許多老先生們的意見多不一致。但據一位民盟的重要負責人說：「任何一個政黨，對問題的看法，起初一定意見有出入，何況民盟代表了好幾個政團，可是，每一次經過討論之後一定獲得一致意見然後行事，設問：國民黨，共產黨對於重要問題是否也經過討論，是否由此得到決定，如果不錯，民盟為什麼就不應該這樣？為什麼這樣就被叫做分裂？」

至於張君勳氏去年七月間由吳鐵城祕書長邀他出任，八月中牯嶺也派了兩個人請他上山，九月初吳鼎昌氏從廬山來，也有意用官位來籠絡。外間猜測紛紛，都怕張君勳氏效會琦朝山，都怕民社黨重演青年黨的歷史，但是民盟的負責人却一語道破說：「這不過是政府方面的願望而已。」此外還加以補充：「張君勳氏決不會答應出任什麼部長的。」這些話究竟對不對？他說事實可以證明。在這錯綜複雜的中國政局需要耐心的時候，我們就看一看這張支票的兌現期吧。

但梁漱溟氏請辭民盟祕書長職以後，被人指做「形成不穩形勢的濫觴」。替梁氏造出的理由有兩點：一，對政治已感覺乏味。二，赴昆明調查聞一多案之後，不免有厭世之感。對的，梁先生是一位樸實的學者，本來就沒有什麼政治野心，不過眼看善民不聊生，兄弟鬩牆，他不能不挺身而出，也合力分背十字架。李公樸聞一多的被人暗殺，確實遍地使人明瞭，中國距離民主時代還遠得很。然而這樣就使人怕死了嗎？

對於政治乏味和厭世就真的足梁漱溟先生請辭的原因嗎？筆者最近訪問梁氏，他對這種種揣測的答覆是完全否定的。他說他的辭職決非「突然」，要說出原因來得花上一天的工夫。主要的問題還是脫離了這個地位，對中國大局可以縱所欲言，不必拘束，祇要求得和平，就可以抽出身來，去致力自己立定的目標，無牽無掛，如果大局已經到了無從用力，也祇有設法進行「建樹於將來」的工作。

冷靜一點的人，就在注意於外力的分化，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但是，沈鈞儒氏決非脫盟，章伯鈞氏還是盡力盟內工作，梁氏請辭祕書長是因為「協定簽字又反悔」！那麼，民盟會不會分裂，也就可以下結論了。

政治商談在上海

國大閉幕後，政府致力兩件事，一是恢復和談，一是改組政府，關於恢復和談的風傳不絕如

縷，如政府擬派大員赴延安，如由美方試探中共態度，如因拜年而引起揣測，政府對上述種種跡象並不否認，而且口口聲聲說爲此想靈辦法，傷盡了腦筋。令人遺憾的和談企望只在肚裏盤旋，從未見諸行動。據董必武講給記者的一段故事：張治中從新疆返京後，會詢及如何恢復和談事，張詫異的問董，爲什麼政府一再想恢復和談，而中共竟置之不理呢？董莞爾相告：張將軍你還是從邊疆剛剛回到京都，這邊的花樣可多呢，住久了你便會明白了。至於政府試探和談嗎？自周恩來先生返延後，我（董自稱）見到的政府人員連你（指張）也只有兩位，第一位是邵力子先生元旦來拜年，但並未談什麼。當我回拜時邵先生離家外出，並沒碰到。在董氏的談話中，我們可知政府恢復和談，祇能說期望殷切而已，至於見諸事實的，只是非正式的駁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的兩項和談先決條件，是荒謬的，政府絕不能接受的。此外，便是政府大員向第三方面徵詢對於恢復和談的方案。奔走京滬的張羣雷震都是負有此項使命。

恢復和談既然是可望不可卽的，現實的作法，便是擴大政府基礎加以改組，以顯示政府結束一黨專政，達成聯合政府的三民主義政體誠心。聯合政府所應包羅的分子，限於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如王雲五早已入仕，姑置之不談，政協各黨派除共產黨非政府所能輕易邀請得來的，餘如民盟一部份人士，青年黨，民社黨等，政府對之期望至殷，國大閉幕後，先是在京就便交換意見，隨後，雷震一馬當先跑來上海，說是試探各方改組政府意見，實際上試探不如說是拉攏來得恰當，雷氏帶着輪廓印象趕返覆命後，張羣於大除夕便到上海，十餘日來，終天與青年黨民社黨領，袖以及民盟張瀾、張東蓀、黃炎培、范樸齋等或個別晤談，或聚而餐敘。雷震二次來滬

雖僅住四日，但協助張氏更進一步的打進青年黨民社黨幹部裏層，用各個擊破的戰術，說服反對參加政府的每個人。到今天為止，除民盟人士會肯定答覆，「政府還是先恢復和談緩辦改組罷」，青年民社兩黨雖也有此同感，但輕重尺度頗有出入。雖不百分之百同意政府所說和談改組爲截然兩事，但對恢復和談的信心並非堅定，唯一希望，政府應再作一番「仁至義氣」的工夫，如此，一則可對國人有一交代，一則可有充裕時間融洽內部，布置陣容。

民社黨對於參加國大，意見原不一致，北方元老與張君勳發生爭執，一氣而「不理」民社黨。如今，民社黨又爲了參加政府，內部發生極大爭執，弄得大家共居一處，相遇白眼以待。彼此爭辯最凶的一次，是在二月三日組織委員會的議席上，新從南京歸來的國大代表是主張參加政府的主力，這已經佔了絕大多數，還有一部份想趁國大洗脫未成的問題人物的助威，會議成一面倒的趨勢，爭辯了四五小時之後，吵嚷着要提付表決了，主席張君勳纔斷然決定，暫不作結論，待縝密考慮後再說。會散後，代表該黨發言的宣傳部長徐傳霖，和副部長孫寶毅各執一詞，徐說會上沒作結論，民社黨既然參加國大制定憲法，就該參加政府實行憲政。孫則堅稱：會上已作決定非待包括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實現，民社黨絕不參加政府。徐雖斥孫僅代表個人意見，但張君勳告訴記者，採訪民社黨消息，還是找孫寶毅去談。究竟誰是代表黨意，可就害苦了記者。不得已，打聽民社黨的消息，唯有先看孫寶毅，再找徐傳霖，否則便不得全貌，據該黨某氏告訴記者，主張參加的理由是：（一）政黨的目的是實行主義，不取得政權，主義何得實行？（二）爲擴展政務，參加政府最爲有利。（三）既然參加制憲，何不進而推行憲政，難道還讓國民黨的訓政

繼續下去不成。反對的理由是：（一）難道自己不量力力，究竟分得到幾許位置，難得會相信這個政府，讓你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黨是標榜社會主義的）。（二）參加政府固可得一面協助而擴展黨務，但較諸失掉的人民信譽，得失孰大。（三）當茲漫天烽火，殺聲震天，制憲猶可原諒，行憲全是無稽之談，事實上絕對不可能的。因而，反對的結論，非待國共放下武器，誠心誠意恢復和談完成聯合政府體制，絕不能貿然參加政府；否則，對國家現狀既然無利，民社黨也就自毀前程了。

張君勸願以一個月為期，從長計議參加政府與否的問題。據記者從各方面所獲印象，除他本人淡薄宦途，和少數反對者不肯入套，在衆人勸勉下，民社黨參加政府只是時間問題。政府固殷殷期望民社黨參加，而對張君勸個人爭取尤具熱心。張羣與張君勸晤談幾無日無之，而一再表示來滬休養的吳鐵城先生，日來也頻與張君勸接觸起來，張並允於週內晉京一行，當面和蔣主席洽談時局問題。

青年黨不愧為有歷史的黨，比起民社黨來，顯着有紀律多多，聽說青年黨對參加政府，內部意見也是大同小異，但對外宣傳始終是一致的，並未自亂腳步。就以李璜為例，國大開幕，他自動失蹤，一個人跑到西湖之畔休養身心。他這番行動，青年黨人並不作何評論。到今天，大家還弄不清李的行動是否黨裏授意，還是內部發生意見？這個謎底現在是翻開了，自張羣抵滬，向政協第三方面進行試探改組政府意見後，李氏每天雖仍到閩海漁業公司料理業務，大部時間則是與各方作政治商談。青年黨現已和民社黨聯成一氣，將同一步調與政府週旋，對於政府試探意見的

答覆，也不贊成撤開和談，先行改組政府，雖然左舜生陳啓天等都公開表示過，中共所提兩條件政府絕無接受可能，但總爲以政府還得作一番恢復和談的工夫，萬一和談無希望時，再開參加政府的名單，也不爲遲。

民盟對時局態度，雖已有明確表示，政府却未絕望的不予理會，張羣雷震到滬後，會數晤張瀾、張東蓀、黃炎培、范樸齋、羅隆基等，照樣徵詢他們對恢復和談改組政府的意見，政府雖認爲民盟並非善友政團，僅爲一只中共尾巴而已，但認爲盟員中還有不少「開明」人士，因而也寄以期望。記者以此走訪民盟某領袖，據他分析，政府派員來滬有三大任務，一是拉攏青年黨民社黨參加政府，二是探試恢復和談方案，三是分化民盟，民盟現在正開二中全會，分化是不會有成就的。民盟二中全會已於十日閉幕，外傳張瀾準備辭掉主席說，並非事實；張東蓀更繼任祕書主任職務，短期或不會返平執教；黃炎培終日出席全會，並未稍解，范樸齋幾爲張瀾左右手，張氏大部文稿講詞都出自范氏手筆，范且碰人便說，十年之內絕不作官，這十年還不是今日開始，而是指聯合政府成立之日起算數。至于羅隆基，民盟的大會宣言便由羅主稿，這一篇洋洋萬餘言的民盟時局主張，足可看出羅對政局態度。所以說，民盟參加政府，一時很難看出有什麼苗頭，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和談外紀

身繫國家安危的和談代表們，在滬頻頻會談之後，曾一度飛往南京。國共談判止於六月底，美方調人和國內第三方面人士，在漫長酷暑中，先是奔走京滬，繼而往來京滬，才望到南京重聚的場面，真不容易呵！這裏，丟開和談正題不談，單說周恩來先生從九月十六日（三十五年）移居上海，和談中心逐漸轉移，直到政府特派勸駕的吳邵兩大員來滬，上海政治空氣，一時登峯造極。新聞記者追隨幹旋和平的三方面人士，在馬斯南路一〇七號，海格路籬園，海格路望廬穿來穿去，從清晨到午夜，這幾處簡直變成政治記者之家了。

周恩來寓於馬斯南路一〇七號，一所不大不小的花園洋房，聽說是在去年三月間，以八根半條子頂租來的。樓房已是相當陳舊，庭前一方草坪上，長着一顆古老的聖誕樹；那位風趣盎然的中共發言人陳康，便常在樹下接待往訪的新聞記者，「拒絕」答覆書面談話以外的問題。正面的問題他固且儘量迴避，但是閒談由來去縱，他會滔滔不絕供給參考材料。陳康雖祇有三十四歲年紀，由於十年來東奔西跑，當然有着一份相當豐富的政治經驗。他可陪伴你從中午談到薄暮，使你時時會感到親切有味。但從張家口攻陷後，他的話已逐漸減縮，說這齣戲該政府出場了，中共不能表演什麼了。話雖如此，大家還是經常攀談着，固然存心從他那裏搜索蛛絲跡馬，但多數時間，還是另有所為，為的是從出入在周寓的第三方面人士中，探聽一些和談進展。周氏一向送客出門後，便加快脚步折回房裏，新聞眼便釘牢訪客身上。這其中，民盟的宣傳部長羅基隆常會被迫說出一些錢索，但細微得有時等於無有。儘管大家圍得水洩不通，想盡了話頭去旁敲側擊，他總會脫陣而去。如遇沈鈞儒先生搭乘他的吉普車，沈老常會替他解圍，等到大家轉移目標

，集中到沈老時，羅氏則趕忙止住沈老的下話，說：「我要替你解圍了。」收獲最大的一次，還是延安聲明發表後，各方面代表在周寓作首次會談的當晚。那一晚，出入會場的人，都深沉着臉，顯着商談桌上的荊棘坎坷，空氣緊張到令人窒息。新聞記者在草坪上挨過三小時夜風侵襲，正苦莫奈何，吳鐵城氏竟匆匆走出客廳。大家正擔心有了突變；緊追之下，吳氏才說：會中正爲「政府八項辦法和中共的兩次聲明」作比較研究，懸懸不安的心，這才稍微安定。不管兩方要價有多大距離，究竟還容大家比較研究，也不值得慶幸嗎？

海格路範圍裏兩所巨宅，時常作爲第三方面人士集議處所，是一張君勸寓，一是徐志摩夫人寓。張氏自在渝喪偶後，現與兩兒一女居於該處。張寓的會客廳很小，勉強容納十幾位賓客；每逢開會時，擠得滿坑滿谷的，轉動維艱，爲免室內風聲外洩，樓廳大門常是緊鎖着；記者祇好鵠立庭園中，靜候會後發佈消息，張宅有位粵籍老僕，名叫阿唐，喜與記者攀談；每一提起羅隆基、章伯鈞來，阿唐搖頭不已。他常會指手劃足，用廣東官話描述羅章的談姿，他們常常仰身沙發上，紙烟不絕於口，吸一口談一談，弄得滿地都是烟灰，害得地一天都爲他們忙。有時談到深夜一兩點鐘了，還要他出去敲門買紙烟。阿唐對於這些政治家，真不服氣。因而，每當羅隆基向記者發佈新聞時，他會插言插語；善於應對的羅氏，對於阿唐，祇有點頭，每逢阿唐發表議論時，羅氏祇好住下話，等到阿唐的話說完，再住下說。

徐志摩夫人是張君勸的胞妹；住在張氏隔壁，宅子比較大些。吳邵兩大員抵滬當晚，第三方面人士會邀請兩氏在徐宅會晤。記者們以初來此宅，不識門徑，蹲在牆腳望着會客廳中，杯光人

影，巧像影戲。主人以為新聞記者在外偷聽，急忙進室報告；會中一聽有記者在外偷聽，一時嚴重得不得了，羅隆基急忙出來「驅逐」，害得大家窘狀不堪。一場誤會解釋後，記者們便又重回張宅守候。

吳鐵城的海格路寓邸，名為望廬，西式平房一所，稱得上富麗堂皇。聽說此房還是吳氏身任上海市長時所置，室內擺設紀念什物，上款還都是「吳市長留念」字樣。上海末次會談是在該宅大廳內；玻璃門內，高談闊論，室外不透絲微。佇立廳外的記者們，在兩小時會議過程中只聽到一陣掌聲。會後探詢時，才知是周恩來接受赴京之邀時，大家才鼓掌歡賀。吳邵兩氏以勸駕任務已達，頗現興奮，會邀記者入室發表會談經過。正文談過，大家要知道會談的情形，羅隆基隨指邵力子說：邵老在商談時常睡覺，別人說邵老是邊談邊睡，邵老回答：總比邊談邊打好！攝影記者爲了攝取這難得的歷史鏡頭，除拍取全體照，並請吳鐵城與周恩來握手留念。吳氏伸出手後，周用力的搖握著，大家感動極了，衷心期望着這不止是鏡頭，希望真的會有這麼一天，從會場上的黨魁們，到戰場上的兵士們，大家都會握起手來。

關於五人小組

要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是由司徒雷登大使的建議，打算邀集國共兩黨的代表來專門討論改組國府委員問題的。

當然，要改組政府，我們是很歡迎的。政府老早就應該改組了，政治協商會議已經有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不僅限於國府委員，連行政院和地方政權都是包含着的；而且改組後的政府所當遵照的施政綱領，即「和平建國綱領」：也同時得到了協議。這些都已經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在政府未還都以前，也會密鑼緊鼓地醞釀過一番改組的聲浪，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國府委員的名額分配上，便碰上了暗礁。我們現在也不妨把這些往事回顧一下吧。

在改組政府的協議裏面，第一項所揭出的便是「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人」，至於名額的如何分配，便只有口頭協定而未及成文化。四十委員中，國民黨佔二十，餘二十名由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分配。但中共及民主同盟爲了要保持三分之一的否決權，故至少必須有十四個名額。什麼叫做三分之一的否決權？對於政協各項協議不大明瞭的朋友，或許到現在都還在五里霧中吧。對於這樣的朋友，我要向他推薦歷史文選社所編選的「政協文獻」一書，那裏面關於政協的各項協議及討論等，應有儘有。這是極重要的歷史文獻，事實上是目前中國的民主法典，是應該人手一篇的。我在這兒只把那有關的一項揭在左邊：

「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一般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之。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決議。某一議案，如其內容是否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發生疑義時，由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解釋之。」

這是關於國民政府委員會的一項極重要的協議。在野的民主力量爲了保衛「和平建國綱領」，就保持了這一點點的限制，要變更綱領時，不能像一般議案一樣，憑過半數通過，必須「三分

之二贊成」。四十名的三分之二是二十七名。反過來，如有三分之一的反對便不能成立，四十名的三分之一必須是十四名。這就是三分之一的否決權，也就是中共和民盟所以要爭取十四個委員名額的基本原因。

這一點點的爭取的確是非常重要的。施政綱領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共同協議的成果，也就是今天用訓政走到憲政的新法統，當然是由大家共同遵守的。假如要變更它，就像普通議案一樣，憑過半數的多數表決，那嗎在國民黨方面只須爭取得黨外一票，便可以隨時推翻綱領，結果便使改組政府完全失掉意義。

然而爭端却不幸就在這兒發生了。中共和民盟想爭取這十四名的三分之一的否決權，而中共和民盟以外的人却不願中共和民盟取得這項權利。青年黨爭得最起勁，他至少要 and 民盟爭取同等的名額。無黨無派的王雲五先生則提出「八，四，四，四」的比例，便是中共八名，民盟，青年黨及無黨無派各佔四名。看來好像很公平，而事實上却是打破了三分之一的否決權，中共和民盟只有十二票。自然也許有人會說：難道除中共和民盟而外誰都不民主了嗎？這問題只好讓事實來答覆。青年黨自認是「政府與黨」，不必多費唇舌。無黨無派的公正性已經被王雲五先生本人便代表乾淨了，他自己不是不等到協議的改組，而已經先跳進政府裏面去了嗎？這些，還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這些其實本是枝節的問題，假使讓我來作公正人的話，問題的解決倒並不費事。我想有兩項辦法。第一項的辦法就照着王雲五先生的「八，四，四，四」的比例也可以，但最好要請第一大

黨的國民黨慷慨一點，由所有的二十名里面讓出二名來送給民盟。這樣使民盟與中共的要求得到滿足，也使民盟六派分配平均。而且這種辦法是有例可援的，關於國大代表的名額，政府不是讓了十名給民盟嗎？這項辦法如果得不到同意，那嗎第二項辦法就只好使青年黨和無黨無派的人稍微委曲一下。民盟的構成照政協會議上政府所發表的名單是分爲六個單位的，便是民盟，國社黨，救國會，第三黨，職教社，村教社。每一個單位，論道理應該各有一名。青年黨原是民盟的一個單位，天公地道的說也應該只能佔一名。剩下的十一名，假使中共要八名的話，那嗎無黨無派便可能有三名了。這樣分配似乎也可以相安無事的。

話又說回頭來吧，這些問題老早都成爲歷史了。自從政府還都以後，政治問題久已不談，一切的政協決議都被置諸高閣了，內戰由東北打到蘇北，由蘇北打到熱河，由熱河打到張家口，由張家口打到延安，而後方的政治暗殺和毆打事件幾乎沒有一日的休息，中國爲什麼竟鬧到了這樣？這是大家應該想想的！

孫科與政協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雖由蔣主席擔任主席，可是蔣主席出席此項會議的次數並不多，會議主席一職，實際經常由現任立法院長孫科先生擔任的。

他是國父中山先生的哲嗣，在抗戰時期又曾兩度出使莫斯科，力倡中蘇兩國不僅戰時應合作

禦敵，且戰後仍當團結合作，以奠立遠東和平。我們應當不做反蘇基地，而作美蘇橋樑，這個道理，孫院長了解得最透澈。

他在重慶的官邸——矗立在嘉陵江的圓廬，有兩大特點：一為藏書萬卷，一為賓客盈門。前者；因為他本人在公餘之暇，勤於讀書，特別喜歡讀戰時出版的外國書報雜誌。後者，由於他好客，經常約集學者專家，討論政治經濟等各項問題。

對於戰時糧食公賣，以及財政金融的改革，他曾經在重慶發表過獨特的見解，可惜當局并未採納，抗戰後期，民主呼聲，響遍大後方，孫院長也是極力主張實行民主改革的有力發言人之一，曾經有人把他比擬為中國的華萊士，這未必十分恰當。只有「勇於發言」這一點上，或者與美國的華萊士部長有類似之處。

當政協會議鋪成一條使中國走向和平民主大道時，他也是辛勤而具有信心的工匠之一。會幾何時，國民黨二中全會，及國民參政會，相繼舉行，若干右派人士，對所謂「政協派」來了一次激烈的反攻，此後內戰就越打越兇，按照政協決議來辦事的希望，愈益渺茫了。

大局既使他憂心如焚，而小局也使他傷透了腦筋。所謂小局者，是指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的糾紛。立法院否決過公司法，但公司法竟依然「如擬通過。」立法院不贊成在經濟部以外，又設立一個「屋上架床」的最高經濟委員會，然而，這一個機構，亦竟如期成立，宋院長還說了一句風涼話：「不必管立法院。好在此刻的立法委員，都不是民選的。」

不錯，立法院最大的弱點，是并非經過民選的。溯源求本，孫院長也希望早日完成一部統

一的憲法，早日實行民選，組成民主的政府，使中國政治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

孫院長是黨國元老，他之忠實於黨，以及忠實國父遺教，無人敢加以懷疑，但默察他近兩三年來的言論，他是一個對現狀不滿的人，特別對當前貪污橫行，官僚資本猖獗，以及官僚，買辦，封建勢力合而為一的現象，深惡痛絕。所以，他切望各黨派仍回到政協的舊路上，來求取政治解決之道，不要再想在戰場上解決問題。

在這一信念上，政府政協代表邵力子先生，及王世杰先生，都是他的同志。他們看世界大勢，看中國現狀，都要比一般人更深遠一點。

政協道路是打開僵局的正路，但自從「捨正路而不由」之後，馬帥與司徒大使，果然忙得席不暇暖，但事實所示，除內戰更加擴大之外，別無成就。足證政協以外的道路，現在是越走越狹了。

非正式商談的前前後後

自從去年六月底兩度休戰以來，停戰問題就膠着在有條件停和無條件停上面。政府主張要停戰可以，但要先獲得解決幾個其他問題的保證，最初政府提出了五點，後來改提了八條。最後表示先交國大名單再講。但政府某代表旋又表示：要獲得停戰，其餘七點還是要解決的。雖然不一定要中共形式上表明接受，但實際都必須辦到。

中共從要求拿保證停戰作爲參加非正式五人小組時起，到同意第三方面提出的「談，停，談」的程序止，始終主張必須無條件，無限期停戰。對政府提出要先交國大名單的意見堅決拒絕。並且表示交一部份，甚至幾個人也不行。

在張家口和安東相繼爲國軍進佔以後，很多人對中共是否還是主張無條件停戰，已表示懷疑。有人以爲中共必然不再堅持，而可以適當的接受一些條件了。有人以爲中共一定更氣憤，更堅決，不會再同意無條件停戰，或者要提出相反的，要政府如何如何的要求了。然而這兩種揣測都錯了，他們還是咬定了那句話「中共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戰。」不過這句話好久沒說了。

不過無條件就地停戰和在今後駐軍區域上是否承認，依照目前狀況是很有距離的。也就因此，政府在沒得到別的權益的保證前，仍是不同意先停戰再談的。雖然政府一再說明要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內問題，但是既然政府擁有優勢的裝備，在政治上不能滿意解決前，是不會放棄繼續拿武力形成一些既成事實的。

關於國大，表面上擱淺在交不交名單上，實際却是爭執於它的召開符合不符合政協原意。在政府的立場上，這多年受盡了在野黨派們的指責，說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及早召開國大，制定憲法，對人民，對國際說起來，都比目前更好。而且已頒佈的日期就要來了。國際上正在舉行的聯合國大會又是一種迫使中國在國內問題上應該表現得更好的因素。事情實在是火急了，無怪乎政府表示只要交名單，就是先交幾個政協代表的名單作各方的國大代表也好了。

中共認爲當初五月五日的日期是政協追認的，後來延期是綜合小組的意見。再定期應由各

方協商決定，而且增加名額的分配，也還沒作最後決定。名單要交，也還只能交給改組後的政府。現在不但不能受十一月十二日的約束，而且行政院不和國府委員會同時改組，政府就沒有改組完成，就沒有交名單的對象。

問題又涉及到政府改組上來了，政府以爲國府委員會可以先改組，但行政院只能在國大以後再說。中共却認爲這是不合政協決議的路程的。

因而有人說：「中共真是，爲什麼轉一點小灣都不行，非直挺挺的走？」也有人說：「政府真是，爲什麼不直着走，不轉一個灣呢？」

在各方代表來京之初，第三方面宴會時陳立夫先生和周恩來先生針鋒相對的一幕，大約就是對上面的疑問，國共雙方的回答吧。陳立夫先生說：希望大家不要只顧小節，而注意大的關鍵。周恩來先生說：主要的固然大關鍵上，但小問題也不能不注意，比如X加Y等於四，然而如不追究X是幾，Y是幾也不行。

不僅國共雙方在國大問題上相持不下，第三方面也不同意即時交出名單。聽說在上海，第三方面就已互相保證，如不按照政協決議的程序，絕不交出國大的名單。在南京見蔣主席時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雖然苦口婆心的第三方面現在還不願公開表示意見，怕使局面更僵，但是事實已很少再有迴旋的餘地了。

對第三方面建議召開政協綜合小組或非正式綜合小組，政府雖沒公開答覆。但大概是未曾同意，否則，第三方面不會只表示重視和還要開會研究了。這個新建議和他們過去的努力

宣傳休戰，和平方案一樣，就要寂寂無聲了。但這並不是第三方面的失敗，因為此來原就是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來的。雖然，這是中國人民一個可悲的結果。

好事多磨的國民大會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在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大樓三樓舉行，到吳鼎昌、陳立夫、白崇禧、陳誠、邵力子、梁寒操等二十餘人，蔣主席親臨主持，通過了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又通過了政協五項決議有效，具體辦法，另行擬定。可是中共與民盟都說這是政府片面的決定，沒有經過各方面商量，也沒有經過綜合小組來討論，要求保留對此問題的發言權。

在抗戰期中，國大問題也會熱烈地討論過，廿八年九月九日開幕的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中，對這個問題會作如下的決定：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同年的十一月間國民黨六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有關國大的決議，即定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可是因為準備的不充分，與代表性的不完整而改期，這却提高了人民對這問題的關切。在大後方，在敵後的游擊區，都展開了對民主憲政的研究，可以說是因參政會第四次大會與六中全會的決議所刺激誘發起來的。

去年一月十日的政治協商會議，對國大問題也曾引起激烈的爭辯，在一月十七、十八兩次

會議中，政府代表張厲生、邵力子、陳立夫，中共代表周恩來、鄧穎超、陸定一、吳玉章，民盟代表章伯鈞、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青年黨的會琦，無黨無派的胡政之、邵從恩、郭沫若、錢新之、王雲五等都熱烈發言。首先，由政府方面提出關於國大問題的四點意見，第一點就是定三十三年五月五日召開國大，並由張厲生作口頭說明，中共方面由鄧穎超代表發言，猛烈評擊國大組織法與選舉法的不合理。她說：由這兩種法看來，很顯然地看出代表不是完全由人民直接普選的，而是由一黨主持的。並且舉出了選舉法第四條的規定：「背叛國民政府，經判決尚在通緝中者，不能有選舉權」。鄧女士說這明明是十年前對中共而言的，現在更不合適，整個的辯論焦點在舊代表的有效與否上，一直到周恩來起來作了一個明確的聲明說關於舊代表問題，只要在別的問題上找到了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中共承認舊代表有效，雖然違背民主，人民或者可以諒解，否則對人民就不好交代了。他作了這樣一個聲明，會場的空氣頓時和緩下來，後來雖然有陳立夫與陸定一兩人因「三三制」起了一番辯論，又因張厲生發了一些題外的感慨，引起張君勱的火氣，可是終算討論完畢，而在一月卅一日獲得了關於國民大會的八項協議，大家同意卅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大，緊接着的二中全會，對政協決議作了一個通盤的討論，關於憲草原則的協商修改原則又作了一次修改。吳稚暉提了三點很硬性的議案，大大地修改了政協的協議提案的第一點說：制憲之權責，屬於國民大會，無論何人，不能限制國大代表之法定職權。中共在三月十七日發表了一篇談話，反對對憲法原則的決議有任何修改，國共兩方的爭辯延長了一個多月，中共發表在政協會中所決定的憲法原則未得保證前決不參加國大。

國府還都的前夕——四月二十四日蔣主席在國民政府茶會招待政協綜合小組的全體代表，政府代表全體出席，中共由周恩來代表，首先由主席致詞，繼由張君勱發言稱爲顧及現實，國大應延期，周恩來、傅斯年、曾琦、王雲五亦發言贊同延期，蔣主席即席表示五五國大延期舉行，王雲五曾發問延至何時？主席答以俟各方面問題解決後再召開，並稱國府自明日（四月二十五日）起停止辦公，希各黨派代表同時進京共商國是。主席這一果斷英明的決定，博得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可是南京早已到了不少代表，還有一部份代表乘上國大代表專輪赴京，在途中得到延期的消息，非常激動，記得孔庚老先生在國大代表專輪——民裕上面，激昂地說政府不開，我們自動開，並且就在船上忙着發電報，寫信到各地，通知各地代表即日晉京，自行召開國大，已在京的代表們也有同樣表示，在南京的一次茶會上，邵力子先生幾乎被代表們毆擊了，因爲他們要求召開準備會，邵先生說於法無據，結果還是由蔣主席親自解釋一番，才沒有「自動召開」，代表們就借這個機會，到各地觀光去了。

從此以後，國大問題沉默了兩個月，談判復談判，政府終於七月三日宣佈十一月十二日爲國大會期，另一方面，中共也一再跟着非正式表示，如果政府單獨召開國大，共產黨也將「開一人民大會」，以爲對抗，因此直到雙十節那天，一般人還想像國大可能又延期，而第三方面的調解方案，也以暫緩發佈國大代表召集令爲要求。却不料十月十一日的局勢急轉直下，這一天，下午二時國軍攻克張家口，最高當局接到陳誠總長的電話，五時即召集吳鼎昌、陳立夫、吳鐵城、陳布雷、張厲生五、人談話，斷然決定十二日頒佈召集令，下午八時，彭部長發表聲明，

許多要人，連邵力子先生事先都沒有知道。

林世良之死

孔祥熙先生的太太宋霽齡女士，她雖不是當今天官，却有極大權力，女兒「孔二小姐」更是喧赫一時的貴千金。孔太太說得一口流利英國話，早年會當過孫總理的英文祕書，她極善經商，從經商中掙起一份鉅大家財，真是富堪敵國，但是她並不懶足，更不停地興風作浪，她是今日中國官僚資本的權威，並且也是每次政治陰謀幕後牽線人。她對於她的丈夫很滿意，滿意的原因據她自己對她的妹子宋慶齡說：「庸之很聽話，很會做生意」，她手下有一羣做生意的忠實幹部，林世良就是其中之一。林世良跟她當了幾年夥計，也是因為「很聽話，很會做生意」，蒙她的女主人用她丈夫的職權，提拔他去當中央信託局昆明經理，昆明在抗戰期中，是一個經濟重鎮，當着我國唯一國際路線——滇緬路的吐納口，是發國難財大腹賈的掏金地，當然也是生意眼的重要據點。

民國卅一年仰光失守，緬甸情勢危急，我最高當局下令滇緬路停止商貨運輸，途中車輛無論官商所有，一律搶運存緬軍用品撤入國境，因此滯留在緬甸首都曼特蘭及滇緬路之轉運站黃丁兩地商貨，堆積如山。如有人能運一車入國境，即可大發其財，這正是最好的良機。林世良奉命以昆明中央信託局名義派汽車四十輛，由緬甸裝運貨物入國境。車到昆明時，突被軍統人

員查獲扣留，電呈蔣主席請示。林世良着了急，一面報告孔夫人，一面漏夜塗改昆明中央信託局帳簿，據說這些貨品都是公家的。蔣主席接到戴笠的報告，並且知道所扣四十大車的商貨，都是些奢侈品，盛怒之下，立命軍法總監何成濬將林扣押，解渝審辦。林在軍法庭上，抵賴不過，他相信他的主人是有辦法的，於是很坦直的供了出來，這四十大車奢侈品是他的主人孔夫人所有，他是奉這位女主人之命而這樣做的。軍法官似乎是一位患着重聽症的，他只記着「中央信託局昆明經理林世良利用職權經營商業。」孔夫人聞訊立派丈夫孔公，兄弟宋公二人，去軍法執行總監力保，何總監以案關蔣主席交辦，未便釋放。孔宋二公乃請何幫忙將此案拖攔，蔣主席以此案多日未見呈判，他猜到了擱淺的原因，於是示意給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第二天，大公報的社論猛力評擊此案，要求政府立刻槍決林世良。蔣主席指着這篇社論對何成濬說：「你看，外面輿論如此，你快把林世良判了死刑，呈送來核批」。

第三天判決書呈送蔣主席核批，却把它放到普通公文中去。這當然是孔夫人的神通廣大。時正中午，馮玉祥將軍突來求見。蔣見馮滿頭是汗，手中提一光亮燈籠，怪而問之。馮答曰：「外面盡是黑暗，我在黑暗中急行十里，進了主席房間，始見光明」。說畢，將燈籠吹熄，置蔣主席辦公桌上，蔣聞言，立召軍法總監何成濬入室，以手令與林世良判決書付何曰：「限你在一小時之內，將林世良執行槍決，如逾時未執行，我不槍斃林世良而槍斃你」！至此，何得奉命執行。

等到孔夫人與孔公聞訊趕到蔣主席那裏，林世良已直挺挺倒在刑場上了。

外交界登龍術

我們的老大貴國，自從滿清末年，開始和「友邦」接觸，賞識了外交的重要以來，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如今，將近百年了。究竟出了多少的外交人材呢？在滿清手裏，除了曇花一現的郭高濤、會紀澤、薛福成等外，還不是始終靠着李鴻章在撐持！等到滿清倒了，總理衙門，由外務部演變成外交部，民國初期主持外交政策的人物，如唐紹儀，孫寶琦這些老者，也都還是清朝的「遺產」。

好容易出來了一個顧維鈞，憑藉着優越的背景，因緣時會，平步青雲。北洋政府的全部外交史，也不過是他和退休了不久的顏惠慶施肇基這幾個人，走馬燈般來來去去而已。

革命又革命，國民政府成立。承繼着奮志以歿的伍廷芳來策劃「黨」的外交的，就是現在外交界唯一的元老王寵惠先生。純粹革命產兒的外交家，除了他之外，就祇數得出郭泰祺和現任外交部長王世杰了。

第二次大戰結束，再開和會，眼見人家友邦，幾乎都是新角出台，出席第一次和會的老前輩，不是死了，就是告老讓賢，給下一代的英雄來表演。回看我們呢，却仍然仗着兼兼二毛的幾塊老招牌，在那裏撐門面！難道說我們就當真培養不出新人材來麼？並不一定絕對沒有，譬如說：高致出身的新任駐暹大使李鐵錚，和現在常務次長劉楷，就都是在十年之間，崛起稱

雄，由部曹躍居首要的。不過，這樣的例子畢竟太少了，都在聽鼓畫諾；蓋章拿錢之間，消磨了有爲的歲月。

事實擺在眼前，外交人員任用的水準，確是高於其他機關。除了歷任首長到任時，帶進來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新細胞的吸收，不外乎兩條大道：第一條是高考及權，分發來部，因爲高考及格的人照例先要在中央政治學校受訓的，所以由這條路登龍的人們裏，就包括着中正校外交系畢業，分部實習的學生。另外一條路，就是外交世家和元老勳貴的子弟，依其志願而投身於外交界，像這一類的人，與前清的「恩襲」「蔭封」，頗爲相類。他們憑藉父兄的勢力，要想投入外交界，當然易如反掌。因爲平素家庭聞耳濡目染，薰陶有素，所以以外交爲職業，倒也合式。就是素以文官制度嚴密著稱的英國，在挑選外交人員時，也特別注意於勳貴子弟。前一類的人呢，當然就相當於從前的「科舉出身」了。這一勢力的發展，起始於徐謨任外長之時。徐氏本人，就是三致出身，由學習員薦升到次長的。一朝權在手，要想爭得羣衆，就替高致出身的人、打開了這一條門路。因爲徐氏任外長最久，所以高考出身在外交界的地盤，打得很穩固。從這兩條路投入外交界的人員，分別的，自成集團，堡壘森嚴，勢同水火。「蔭進來的」，把「考進來的」看作半瓶醋是盪蕩酸，「考進來的」把「蔭進來的」看作不知天高地厚的執樞。可是知道內情的第三者看來，平心論斷：兩個集團裏，各有其出類拔萃的人物；也開始沒有其混混噩噩，吃飽了飯專等拉屎的鼻濃。優者自優，劣者自劣，這完全是個人的問題與來路怎樣，毫不相干。

不管是「考的」也罷，是「蔭的」也罷，既然水準比一般都高，怎麼還是造就不出新的幹材，來繼承前輩的事業呢？第一、歷年來的戰爭和物價高漲，逼得這一班初創事業，基礎未固的青年人，喘息於生活的重担之下，他們覺得中國之大，竟沒有他們可以安息的地方。外國雖說也有限價，黑市，計口授糧，憑證購物等種種不便，可是比起中國來，還是天堂，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早點「開放」，出國享福！外交部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凡初入外交界的人，必須在部裏練習一個時期——譬如說，一年吧，——方得「開放」。就是在國外三年住滿，調回來的人，也須在部裏混過一年，再行外派。原來的目的，是要外交人員，多知道點國內情形，免得到了外國之後，祇知道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用意不可說是不深；法則不可說是不美，可是大家都把這「一年」的期限，看作有期徒刑，有辦法的人，千方百計，所求的是「破格」，「提前」。萬一到了一年期滿，還沒有出國的喜訊呢？就不免長呼短嘆，萬念俱灰！外交人員的圈子裏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警噱，說是：進外交界，就好比是在街頭等公共汽車，繞得得以錄充部曹，就和排上了隊一般，總可以有上車的希望。至於早一刻，遲一刻上車，其間變化因素太多，誰都沒有十分把握。甚至於等你好不容易輪到排頭，忽然來了一個蠻不講理的大漢，把你擠得後退一步，也都不算是意外的事。待到一紙令下，調補外缺，其心惶恐怕就相當於候輪子等車的人，擠上了車，聽得一聲哨，絕塵駛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外交人員的唯一目標，就是「出國」；所講求的手段，不外乎「奔競」、「鑽營」。更能够有什麼餘暇，可以把心情安定一下，研究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呢？還有熱中於豪華富貴之流，爲了「出

國」，更不惜降格相求：外交部頂頭上級機關的堂堂參事，爲了「出國」，可以屈尊俯就他平常所不屑一顧的總領事缺；以外交爲終身職業，熟了半輩子，應該當大使的人，爲了「提前出國」，也可以不卑小官，欣然去當公使。

第二、人事上的牽絆，也影響了新外交幹部的產生。外交系統的人事制度，在政府的任何部門中，算是比較上軌道的，但是仍然不能做到完全合理的地步。代表一個國家，長期駐紮他國的外交代表，假若不是熟悉國策，技術精深的人物，是絕對不能勝任愉快的。現在放眼一看，我們的外交代表，有許多是冒充的腳色，所見到的是；不甘閑散的中央委員；因故去職的將軍；某名公的舅子，看吧！說不定將來國大代表名額內所安插不了的社會賢達，也要以出國充當大使公使爲出路哩！固然，政務官的任用，在公務員任用法裏是有明文規定，不限資格的，大使公使都是政務官，所以政府對於他們的任命，是有選賢任能的絕對自由，不必一定在計畫循序的外交人員裏面挑選的。可是，在這種「拉到籃裏就是菜」的辦法之下，究竟提拔了多少外交方面的賢能呢？這一羣在國外獨當一面的新貴，一方面既沒有法子叫他們去折衝樽俎；另一方面他們却阻塞了不少在外交界裏磨白了頭髮的人員的陞遷之路。資格較深的人，尙且上去，資格較淺的年青人，是不問可知，更難望有翻身之日了。

在本身的頹廢，和環境的壓迫這雙重的斲喪之下，外交界縱有可以培養的幼苗，也早就枯死了。不信，請看民國以來的外交界的情形，我們幾時方能看見中國產生一個像威廉底特這樣的外交家出來？

馮玉祥的得意傑作

馮玉祥將軍有一手拿手戲，他會用一句話把千萬士兵說得服服貼貼，也可以把一句話說得士兵們勇氣百倍。在民國十五年前，他與中央對抗，中央軍飛機去轟炸他的隊伍，士兵們對飛機恐懼萬分，一聽到飛機聲大家亂逃。馮於是把全體士兵集合起來訓話。他說：「我們頭上的鳥，比飛機不知要多多少，鳥在空中拉糞，尙且沒有拉到我們的頭上來，我們還怕他這一二架飛機來投彈嗎？」士兵們大家想一想，果然不錯，以後有飛機來大家便不慌亂了。

卅一年他到江津縣白沙鎮（是四川省有名的大鎮）去發動良心救國捐獻，他召集了當地萬餘個老百姓，叫他們在烈日下向大資本家下跪，非得到那位大資本家認捐了一筆大款不起來。馮很會隨機應變，腦子非常奇巧，那一天他召集該鎮學生（抗戰時學校內遷，該鎮雖小，而大中學校林立）要他們去義賣，但他並沒有義賣品交給學生，這豈不是文不對題了嗎？不，他自有他的異想天開的妙法，他先對學生來一下情感的激動，說：救國人人有份啊！學生是救國的先鋒啊！他看到學生們大家都激昂了，於是他把言詞轉到正題上，他說「今天我召集大家去義賣，爲什麼不把義賣品交給你們呢？這就是要測驗諸位同學愛國的程度如何？既云義賣，則義賣品當然不必限制，隨便什麼都可以，譬如你們身上穿的襯衫啊！背心啊！都是很好的義賣品。」詞翰未畢，全場裏的學生，大家紛紛把身上的衣著或用品騰出一件來，拿在手裏去義賣。

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與興奮，一霎眼，每個學生都獲得相當好的成績，總數很驚人。馮將軍非常得意。接着他就開始向那些出錢賣義賣品的人宣傳了：「諸位都是熱心愛國人仕，以極大的代價購買不值錢的舊東西，可敬！可敬！諸位要曉得這些義賣品都是這班窮學生身上脫下來的破襯衫，舊背心，諸位拿去沒有用，他們少了要受凍，還是請大家還他們吧！」結果這些義賣品又重回到每個學生的身下了，學生高聲呼着：「馮副委員長萬歲！」

民國卅三年九月，馮在重慶有一幕滑稽的演出，據說他是爲了看不慣當時在渝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的奢侈，他上了一個呈文給國民政府蔣主席，妙文內容如何，我人雖尚未探悉，但在國民政府公文收發簿摘要欄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登記着：「爲呈請准予購買豬肉三斤出」。這種舉動大有淳于髡之風。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

在國共談判之際，國大召開之前，幾個黨合組成了民社黨，這一個新黨的出現，早就有人意味到民盟內部將再有一次新的分化，國共兩黨的爭衡，是棋逢對手不相上下，可是在他們爭衡的天秤以外，依然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法碼，即所謂第三方面，待他們爭取與運用，這一堆法碼，越拿越小，而價值也越大，最後最小的法碼，必是一個決定的法碼，兩大之間難爲小，總使第三方面情誠團結，潔身自好，始能絕對保持超然的地位，在國共兩黨黨性發揮盡致，而

不惜以人民所不喜歡的手段與做法，來謀壓服敵黨的時候，是否由於第三方面的斡旋而有補於國事，却是一個未知之數；「只准成功，不准失敗」，不過是國人的願望而已。如果第三方面一再分化，天秤以外的法碼，越拿越少，增加法碼的一方，氣燄增高，沒拿到法碼的一方，羞怒謾罵，雖然最後的法碼價值增高了，而她能使得雙方平衡的力量無疑的愈小了。哀哀的小民團不在一起，說不出話來，國家人民那只有做黨爭的犧牲品了。

民社黨在南方倉卒組成，北方的老黨員雖與聞其事，多未前往參加，南北老少當然步調難趨一致，民社黨提了國大名單，北方老黨員即表示不參加，共產黨說張君勱先生本人的不參加，是「妓女的貞操」，國民黨方面也有人在竊竊私議，說他們是腳踏兩隻船。民社黨的參加國大，顯然與民盟的裂痕更深了，而民社黨本身也呈露了分裂的跡象。民社黨面對着這一個困惑的問題，南北信使往還，力謀打開這一個為參加國大而招致來的本身分裂。

號稱民社黨北方三元老之一的梁秋水，他並不是北方人，原籍廣東肇慶，生長在桂林，十七歲時來北平，後又到上海入愛國學社讀書，因參加反清運動流亡日本，曾入早稻田大學讀書，後來又去美國，轉往檀香山，在檀香山一方面辦報，一方習英文。他自稱在檀香山三年的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期，因為那時有一位美國的老密斯很賞識他，教給他讀書，給予他很多的幫助。民國改元之後，他回到北京來，做了十年的報人，先後編過「晨鐘報」及英文「北京導報」，隨陳友仁編英文京報華文版時，因為反袁，曾受到過袁世凱多次的警告與威脅。他現在六十四歲的人了，已經兒孫滿堂，眼睛不甚好，談到過去辦報時的情形，時常提到他寫文

章怎樣怎樣，似乎對自己的「才氣」很自負，脫不掉中國新聞事業初期才子玩票辦報的色彩。據說民社黨還有意思辦個機關報，請他主持筆政。殊不知現在辦報是自己認識問題，幫助旁人認識問題的時候了，已經不是才子玩弄筆墨的時候。他從十三年閉門家居，二十年的光陰是怎樣度過的，頗使人納悶。他的住宅裏佈置得古香古色，據他自己說，他非常的喜歡北平，愛好一個個的小庭院，佈置上一些小花草。他斜在他自己的客廳的暖閣裏，似乎與那裏的一切都很調和。前些天因為他不贊成民社黨參加國大，拒絕張君勸邀他南下的請求，賦詩言志道：「多謝故人珍重意，久甘岑寂舊生涯，愧無三徑能栽菊，猶有一畦堪種瓜。漫道鷓鴣爭腐鼠，却憐彩鳳逐羣鴉，閒來誰與謀排遣，日過南城賣酒家。」他的詩和他的態度，競為北方各報刊載，於是他成為新聞人物了，多少人去追他，可是也追不出什麼來，大雪節前一日，一夜西風緊，突然有了梁秋水胡海門南去的消息，這該是民社黨一個將有新發展的信號，又促使大家對他更大的注意了。

也算是巧合吧！梁胡南飛前二日，東北經委張主委張公權飛到北平來了，張氏對目前時局拒不表示任何意見，他到北平的當午，就由梁胡兩氏到西郊燕大將張東蓀先生接來東城史家胡同梁秋水的家中，從下午三時起，張、梁、胡、張四人就長談了三小時，七時由張公權作東同去萃華樓吃飯，直至九時始散。有的記者當晚追逐到了他們這個「起居佳」的活動，有的還不知道，標題上寫作「張公權將晤張東蓀乎！」

他們四人談些什麼呢？外人不易得知，次日梁秋水向人表示，張的北來，係順便向他們傳

達乃兄常時決定民社黨參加國大的經過，並沒有旁的意思，記者會詢梁氏，張先生對和談的看法如何，他說：「張先生認為還有恢復的希望。」張氏來平，很明顯的是爲了回東北，可是在這個當兒，就增加了很多人的臆測。梁氏會向記者表示，他們的南去，並非決定於張氏北來之後。可是他們的飛機票倒是在前兩天由東北經委會北平辦事處代爲洽購的。張來當然不是銜有政府使命，對北方民社黨人士有所接洽，也不是爲乃兄代促梁胡南飛，不過傳達了一番乃兄決定民社黨參加國大的經過，自然會增進北方民社黨人士對乃兄的諒解。有了初步諒解，益加堅定其南飛意向，因此民社黨也有了調和南北老少的轉機，由黨而國，自然對國事還要推動一步。怎樣推呢？推向一個什麼方向呢？這得看民社黨演完「南北和」的一幕喜劇以後了。

梁胡東南飛前一日下午九時，他們在史家胡同招待記者，記者們去了，是梁秋水一人在家裏，兒孫隨侍在側，他說他預備發一個書面談話。書面以外的話不希望發表，但是書面談話遲遲不拿出來，說是由旁人抄寫去了。大家坐着無聊，就圍爐閑談起來，梁氏很健談，同大家談他過去的歷史。讀書，教書，辦報，到北方來，去日本，在美國等。這天是北平入冬來最冷的一天（零下十度點七）外邊的風鳴鳴的響，屋裏也有些寒意，過一點鐘比梁秋水長一歲的胡海門老先生來了。長髯鬚，前額有點像沈鈞儒。又過一會短髯的中年人陳璠侯來了，攜來了梁秋水的書面談話，顯然那篇談話是經過什麼人主稿，又經過審慎修正過的，交給胡氏梁氏過目以後，大家將椅拉開，梁氏面向北，記者羣坐在對面，在宣讀書面談話之前，當然梁氏還有幾句前言，那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具有辛亥及五四時代的典型，說到如果不怎樣，即將亡國滅種

時，幾至涕淚交流。前言說過之後，由站在梁氏椅側的他的哲嗣宣讀書面談話。宣讀完畢，記者們當然還有的提一些另外的問題，有的是關於整個時局，有的有關於民社黨的本身，多數都在旁敲側擊來探詢張公權同他們談話的內容。梁秋水是個神經質的老人，他很喜歡說話，而胡海門、張班侯則時常怕梁氏把話說多了，一邊盡力的給他開脫。有人問「張公權是國民黨員？」他們說，「不清楚」。「張氏兩弟兄（指君勱與公權）對時局的看法一致嗎？」答以「差不多相近」。「有多大距離？不同之點何在？」又答以「不遠也不近」。丈八的和尙使人摸不到頭腦。更有人直爽的問：「張公權先生算國民黨的外圍呢？還是真民社黨的外圍呢？」答以「都不算」。胡海門是民盟盟員，（據說民社黨僅有民盟盟員十餘人）梁秋水並不是民盟盟員，談到將來民社與民盟的關係，梁秋水倒說：「宏仁堂同仁堂都是藥家老店。」從他們的談話中有人做這樣的推測，北方民社黨員不參加國大之主張，以梁秋水為最強，胡海門為次強，張班侯則是隨他主張不參加的而希望能以一致參加的人，這推測正確與否無法證實。談話越扯越遠，不知怎的談到婦女參政問題上來了，梁氏主張婦女不必受大學教育，當然更談不參到政，胡張的意見不同。他還說：「這話不能在張申府先生面前來講。」民社與民盟如果和談機會重來，共同致力和平工作是可能的，但從種種跡象上看，確已難期「百年偕老」。就是他們的書面談話中，也透露出一點弦外之音來。

書面談話是以梁秋水一個人的名義發表的，胡張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贊助這個談話的人。梁氏書面談話全文如次：「我們此次赴滬，係因二日接張君勱伍憲子兩先生有急電要我和張

東蓀胡海門三人同去商談一切，大概是滬方已得海門先生的去函，知道我們既有脫離黨的意思，上海方面，遂已深切感覺到這一次事件：是完全起於黨的不健全。乃有重新整頓的意思，我們以多年友誼，故甚願貢獻一切關於整理的意見。所以此行決不談憲法，亦決不談政府改組問題。至於政治方面，是否恢復商談的時期又到來，現在未能懸斷，萬一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亦願隨同愛好和平的國人，爲之呼號，甚至於從事奔走。因爲我們以爲此十年來，全國人們犧牲生命財產，爲的是抗日圖存，萬料不到敵人投降以後，內戰反從此爆發，試問此次內戰，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誰？今日人民的痛苦，視十年來抗日更加十倍，長此下去，非到亡國滅種不可。老百姓死光了，我們還談什麼政治，更談什麼黨。故今日問題，只有和平，才是國人的生路，任何問題，至低須建築在人民安居樂業的條件上。別人以黨爲重，本黨則願犧牲黨以爲國爲民，個人更願犧牲一切以爲黨，先謀黨的團結，再謀國的和平，由和平而得統一，這是於現政府最有利的，所以願在這一方面多盡一些力。關於整理黨事，我們尤注重一個原則，就是要特別提高其中立性，因此對於和民社黨有關係的民盟，我們亦要求其自動加重中立性，倘使外間所傳太偏於另一方面的確是屬實，則本黨更應提高中立性，保持第三者立場，我同海門先生先走，東蓀先生隨後就來，因爲他有學校功課，非覓得代課者不能離開。以上所說，是我們在此處所見到的，最後則需交換意見，方能有所決定。

「一二九」的下午一時梁胡陳及劉景堯四人突然南飛了，這民社黨的二老兩少，當然負有民社黨本身團結使命，融合南北老少。至於對國事的意見，自須會晤張君勳後決定。據說該黨

在東北有急速發展，乘了什麼方便呢？耐人尋味。

民社黨因為梁胡的南飛，會將有一點新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是由整個時局將有新的發展而誘致來的。我們真的也希望國共兩黨爭衡，天秤外的大大小的的法碼，不做爲被爭取與運用的對象，保持第三者立場，加重其真正中立性，對於國事的和平發展而善盡其努力。

司徒大使的苦悶

每逢時局苦悶，悶得實在焦人時，必返籍掃墓，這原是中國要人的做法。如今連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仿照這一套做法，足見司徒氏已十足的「中國化」了。

司徒老人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從來不想做官，尤其不想當外交官。偏偏這一次爲馬歇爾特使看中了，推荐到白宮，意外的當任赫爾利將軍辭職後的懸缺——美國駐華大使。

意外得官，也意外的招來了煩惱。司徒就職之初，六月停戰談判（三十五年）已宣告無疾而終。十月初，以蘇北爲開端的內戰，打得火熱。但爲表示和談不絕如縷起見，陳誠，邵力子，董必武，周恩來，還在往返磋商。可是六月停戰談判所獲致的四項協議，事實上，因中共最後提出無理要求，而未能簽署。

僵局放在南京，蔣主席與馬歇爾將軍，先後飛往廬山避暑。司徒大使，不久亦赴夏都。安平事件，與延安被炸，相繼發生，不難看出時局之嚴重性，竟與日俱增。使大使感到肩頭的担

子，并非沒有份量。

疲勞，苦悶，又加上京帖兩地的氣候炎涼懸殊，司徒大使真的病了。（這倒不是政治病）病在廬山時，他想擺脫大使的職務，回北平燕京大學去，重度他所愛好的靈修生活。但是馬歇爾將軍勸他打消辭意，一不作，二不休，既然上了任，總得做出一點成績來看看。在他病愈之後，訪問蔣主席，再作商談。結果是交了五項條件給大使，要他帶回南京來，轉達給中共代表團。

他在南京明故宮機場下機，心情并不輕鬆，因為上次四條，中共都不肯接受，如今又加上一條，談判怎樣會談得攏來呢？

司徒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南京會晤，所談皆非出於意外，中共依然堅持無理的要求。拒不接受政府一再讓步的寬大條件。後來，又有一次在甯海路馬帥官邸中，周馬進行會談，司徒受馬帥之託，再度提出廬山帶回之條件，嘗試嘗試，結果還是不能接受。

馬帥與司徒發佈聯合聲明之後，司徒大使悄然飛平。他原想在學校裏過一過甯靜的生活，稍舒氣悶。但訪客盈門，打破了他的甯靜，而所談多為政治，外交，尤使他悶悶不樂。只有一次使他略展笑容的，那是他和西南聯大及燕大許多學生談話的時候。他興高采烈的提出了「中國需要新五四精神，需要新革命運動」的主張。

當他飛回南京之時，傳來了美國剩餘物資借款簽訂的消息，馬歇爾將軍飛航於京帖之間甚忙，而美國駐華的四位將軍，居然也在廬山集會。蘇北，隴海綫，膠濟路，大同，晉南，打得

熱烈緊張。司徒大使跑了一次上海，返京提出了召開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談的建議。非正式五人小組這個名詞，真不失為一個富於微妙性的創造。但中共卻要求停戰保證，於是五人會談又告流產，剩餘物資借款的餘波，等於是一盆冷水，澆在談判上，遂使談判昏昏欲睡。

時隔不久，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為美軍槍傷北平輔大附中學生所提的抗議書，遞到了司徒大使手中。

爲了這一個中學生，穿了黃卡其褲子，使美軍看不順眼，而加以追擊，也因為這一擊，才真的引起了北平學生的『新五四運動』。這份抗議書到了司徒手中所引起的苦悶與不安，較旁人尤爲深刻，他曾三電美軍當局，指示妥爲處理此案善後之道。

五人會談不開，中共又提請召開三人會談。但是在大學進攻張垣聲中，談不談畢竟是小事。周恩來到了上海竟返京無期。馬歇爾將軍完成了『八上廬山』的紀錄。蔣主席雖下了廬山，但仍巡行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只有司徒大使孤零零的住在南京，而對和談一籌莫展，自然是意中事。

由於華萊士演說所引起的反響，也在中國各政治集團間震盪。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氏的突然來訪，作社交性的談話，約一小時餘，政府發言人說國大必如期召開，和談睡眠於三五之間，而內戰戰報，又瞬息萬變。……這樣的時局，又碰上秋風秋雨連綿不斷的天氣，你說司徒大使的心中悶不悶！

靈機一動，於是想到到杭州掃墓去了。

軍人政治家黃紹雄

六尺高的軀幹，寬廣的腰圍，却有一雙秀美的手，差不多常常出現在籃球架次，網球場邊，這就是我們要談到的黃季寬將軍。

他是極少數懂得政治的軍人之一。

他喜歡運動，打得一手好網球，如果全國軍人來一個網球賽，他無疑的可以穩獲冠軍。——他的打球老搭擋是一九二五——二七全滬網球錦標郭啓達君。不久以前，上海網球錦標賽請他行開球禮，他來一記強勁有力的發球，有目共賞。

白健生將軍不同意他這玩意兒，對他說：網球運動不值得提倡，中國人玩不起。他回說：可是我們不能因為老百姓坐不起汽車，就提倡人力車，牛車呀！

他今年五十一歲了，可是體格矯健，還可以在球場上奔馳，還可以主持連續十小時以上的會議，或者講三個鐘頭的話，滿不在乎。

民國以來，出現了一批軍人政治家，有兩種典型：一是「封建割據型」，疆圍是固，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如韓青天閣百川馬鴻逵等皆屬之；一是「正統死硬型」，一脈相承，牌頭紮硬，殘殺報人，糟塌百姓，如某某等皆是。

黃季寬氏在三十左右，即以亂世英雄的姿態，奪得廣西政權。自任省長。二十年來先長內

政，後長交通，一度主鄂，兩度開府浙江，前後任封疆大吏凡十五稔，黃氏闢修甚專，加上實際經驗，故對政治了解頗深，尤諳治理，與一般半瓶醋的軍人不同。有一個縣長於晉見時，大吹政績，天花亂墜，辦了多少學校，多少合作社，他僅輕描淡寫的問：你有多少錢。

東南日報南平版社論及黃氏，指爲「在全國主席中資望最深，氣度最闊。」確是有見而云然。最可稱頌的，是他的民主風度，他主浙十年當中，東南日報對省政設施，評擊不留餘地，他從來不以爲忤。有一次黃氏召開全省行政會議，東南日報甚至出專刊來罵，並派一個記者去規黃氏的態度，黃氏告訴那個記者說：報紙能够正面批評政府，這是社會一個大進步，不過程度上還不够，希望能够做到輿論可以強制政府做他所應該做的才好。不由得叫人傾折他的雅度。

黃氏御下甚厚，信任甚專，所以他的幹部樂於爲他效命。抗戰初期，軍風紀第一巡察團巡視浙江，收到很多狀紙，其中廿九是控告各縣縣長的，巡察團據以公開批評浙江吏治不好。黃氏即在紀念周上予以答復道：「被控最多的縣長往往就是最好的縣長，抗戰時期，一個好縣長要推動政令，不能不得罪於巨室，就不能免於被控，一味敷衍的縣長和土豪劣紳打成一片，反而不會被控。」事實上當時被控的縣長確有很多循吏能員在內，一時省府同巡察團鬧得很僵。

二十三年曾受命宣慰蒙旗新疆，跋涉萬里，歸來之後，深以邊垂僻遠，國家鞭長莫及，會草萬言書，請纓經營新疆，如左文襄故事，使邊民內向，中央可紓西顧之憂。蔣主席甚爲嘉納，命計劃進行，黃氏當時請准派兵五師，經費五百萬，卡車數百輛，以交通不便，擬一面前進

馬成

，一面築路，路線的勘定，蓬帳的設置，都有了眉目，突奉令停止進行，黃氏大受打擊：後來才知道有人進讒，每當邊疆有事，輒附膺長嘆，以爲國家籌邊之疏忽也。

未幾，楊暢卿被殞命，黃氏奉命繼長湖北。

抗戰黨開，他受第一戰區副長官，助閻錫山防守三省，氏富於韜略，惟以部隊作戰不力，娘子關一役，頗受挫折，氏頓萌辭意，乃有長浙之命。

第二次長浙，適在抗戰時期，以掣肘孔多，精神上彌感苦痛。省府之內，民教兩廳長均非黃氏親信，黃氏的左右手原任民政廳長黃克強，被勒令去職，兼以不攝兵權，大敵當前，措施艱難。他的政敵，所以打擊之者，無所不有其極，以黃氏起用青年，作風開明，諷其「容共」，（其實當時國共合作，無所謂容共也）而以周恩來返浙省親，使此一風波發展頂點，當時黃周一舉一動，皆上達天聽，兩氏在天目山作外交儀式上之談話，竟有人報告：兩人密談竟霄云。事後黃氏深感關謠之苦，幸中央信認弗衰，乃免於厄。

黃氏爲桂系軍人，與李白黃又爲保定同學，以黃氏傾向中央，頗不相能。西南之變，黃氏曾於炮火連天中，御命飛廣州甯甯調解，卒化干戈爲玉帛。

黃氏早年蓄鬚，美髯于思，粵軍之變，倉卒割鬚跳窗，自粵垣乘輪脫走香港，間不容髮，迄今未再蓄鬚。

某次旋里，與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氏同觀桂劇，一旦角出場，依稀爲兒時所認者。因問馬氏，這不是名旦「鴨蛋」嗎？馬氏道：「不錯」！黃氏又問：「鴨蛋，鴨蛋！是不是爲了她的

臉長得像鴨蛋才那末叫她？」馬氏大笑，說：「你弄錯了，她叫『壓旦』，意思是蓋罩一切且角的意思，那里是『鴨蛋』呢！」

有一個時期，他潛心於科學研究，會創製「七七式步槍」「輕機關槍」和「七七式鎗榴彈筒」，尤其是後者會得中央獎金，在美式配備未到前，會為全國部隊所愛用，後又發明「萬密電報機」，惟未行世。在浙會設置「紹雄科學獎金」。

他能填詞，家學淵源，不同凡響，「上有好者，下必盛焉」，一時東南日報詩刊，盡載廳長專員縣長們唱和佳作，惟多為「四聲未協，八病俱全」之作，讀者苦之。

氏長於領導，而短於組織，浙江的「四年建設計劃」成績未著，良以是也，當然人事掣肘過多，亦不為無因。

黃氏政治道德，有一點值得為之表彰者，即不任用私人是也，在浙十年，桂籍縣長不過二人而已，且均地處僻壤，在裙帶政治中蔚然一股清泉。

黃氏現任監察院副院長，自然另有一番供獻了。

緊張的一天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首都整個政治空氣達到空前緊張，也可以說是紛亂的頂點。從中午大家就說只剩下十二小時了，但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到夜晚九點鐘時仍然是議論紛紛。

紙，沒有一點結果。止午一方面在馬歇爾行館舉行着非正式的三人軍事會議；另一方面在交通銀行內，第三方面人士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下，集議着已迫近眉睫的問題。在他們集會時，曾震祕書長來了，路上車子拋了錨，他跑路跑到交行來，和羅降基，蔣勻田，莫德惠都個別談了話。話還沒有講完，中共的周恩來，李維漢，董必武也到交通銀行來了，羅降基馬上招待他們到另一間房內去。中午蔣主席請張君勱吃飯，下午四時第三方面代表六位，社會賢達莫德惠，繆雲台，胡新之，錢新之，傅斯年，王雲五聯袂去見蔣主席，并帶着那封——請求國大延期的信，沒得要領，六時許又帶着那回信來了，接着見他們的人說，他們出來都只搖頭說不容易，下午第三方面的沈鈞儒，張申府也去和中央交換了意見。下午六時，第三方面又全體在交通銀行集會。晚上，他們又派代表去見蔣主席和訪問中共周恩來，董必武等。政府代表下午也在集會和向蔣主席請示意見。

比各方面代表更加緊張的，要算各報的記者了。大家早上就都破例出動，政府代表公館，參政會，梳園新村，交通銀行，川流不息的，都是記者們的足跡。下午好容易在國大籌備處領取了記者證。不知是誰說彭部長五點半招待記者宣佈國大延期。一窩風似的，大家擁到了中央日三樓。空空的，根本沒有那回事。又有人說是在中宣部招待記者，又都爬上了中宣部的五層樓，才弄清楚只是招待幾個報社的老板，商量國大延期的事。中宣部說：「到現在還不能證實，」交通銀行遂又成了次一個目的地——因為第三方面本定五點半開會。但那兒也是空空的，長桌上放着便條，鉛筆，人還沒來一個。又都只好走開，各自找尋另外的途徑，來證實國大

究竟是舉行，還是延期，還是明天只開個準備會，慢慢的再等正式大會的召開？

關於國大開不開，中共態度是異常明朗的了。他們不提延不延期，根本就否認這個日子。他們已說明了國大不改期，就是分裂。可見其用心之險惡！實際這兩天關於國大是否延期，已變成單純的政府同第三方面鬥法上。八日晚政府的聲明，使第三方面的態度起了個急劇的分野，今天又臨到了一個更明顯的考驗關頭，據說政府自昨晚起就提出了要第三方面提出國大代表名單，然後政府可考慮延期，雖然今天各方面都拒絕這種說法，然而由政府某要員上午所說「大局還有轉機，只看第三方面決定了」看來，這話不是無因的。聽說第三方面內部，以及他所包含的個別派別，內部對這個問題都會展開討論。大部份認為國大要否延期，實在不應與第三方的名單合在一起談。最後決定聯名寫封信請政府延期召開國大，以便從旁解決問題，代替了交名單的卷，然由他們的代表回來時的面容和那封信又原封帶轉看來，大約是凶多吉少了。可是第三方面還是盡力在斡旋，晚上在交通銀行集議時，在吃飯前向行候在會場外的記者們，羅隆基說：「我只能告訴諸位，在最後一分鐘，第三方面仍在努力把死馬當作活馬醫。」其他任何問題，就都再問不出一句結論了。「死馬當作活馬醫」這是一句叫人不能不更加沉重的話。

「死馬」象徵的應該是什麼？

跟和談的空氣一樣緊張的，是國大大會堂中的空氣。會堂門口的工人忙着裝璜，警憲忙着指揮車輛，喝令行人不得在會場附近逗留，人力車，三輪車已經不許在那一段路上行走。樓上新聞組忙着分發記者證。祕書處忙着分送明日上午十一時舉行開幕典禮的通知，已經中午了。

洪蘭友祕書長細心的又想到了主席台掛在國父遺像旁的一面黨旗也許不妥，會使人指責，又趕快叫裁縫再趕製一面一樣大小的國旗，來代替黨旗的位置。

究竟是否延期？隨着時季的轉動，已一點點引人向否定的想頭上走。大家傳說着各國使節已接到明天觀禮的通知了。

國大是否延期，就在這短短的幾個鐘頭，人心一點點更加沉重了。點十鐘，去見蔣主席的王雲五，錢新之回來了。他們帶來大家一個消息——國大延期三天。

這消息使大家緊張了一天的心稍稍鬆弛了。然而，三天真能解決問題嗎？人們心頭又加上新的負重：

南京的外交圈

自從王世杰部長從巴黎回來，帶給了南京外交圈不少生氣。王部長那天在明故宮機場降落，下機時第一個趨前握手的，就是法大使梅理靄，他熱烈地以法語跟王氏候好。王氏告訴他說：「這次在巴黎備受法政府款待，不勝銘感！」梅理靄笑得張開一口大嘴。爲了九龍的治權問題，施諦文大使曾訪過王部長好幾次，首都人士都爲這件事感到憤慨，外部發言人情報司司長何鳳山爲此事會發表一篇談話，謂英方雖因軍事需要，但仍不能中止我在九龍的治權；而且所謂軍事需要，實在也需要點解釋。談話中的這一大段後來大概是因爲施諦文訪王部長的結果。

通知各報館刪去。但中央日報全文登了出來，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英國的作風，然而英國新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包毅德中將率屬員乘旗艦「貝爾法斯特」號訪問首都，外部禮賓司司長李駿曾代表外部登艦歡迎。我新任海軍副總司令桂永清也會親赴艦拜訪。王世杰、白崇禧等首長也正式歡宴包氏等，大家都熱烈舉杯祝賀兩國友誼永結。英國商業訪華團已離英飛華，十月初可抵南京。克里浦斯夫人也訂于十月五日由英飛港，南京當局特派專機赴港迎接，預定九日抵京。這一切都在顯示另一方面中英的外交叉何等親密。新聞記者去傅厚崗九號英大使館訪問施諦文，他老是那一套傳統的英國紳士作風，甚至參事華麟哲，也強作道貌地賣弄那一套。

與其說司徒雷登是大使，不如說他還是傳教士，他天天忙着迎送客人或被人迎送。雖然他熟透了中國的一切，然而忠實的教育家和傳教士怎能鬥得過政客們呢？於是乎他祇好在禮拜堂裏證道，並禱告上帝的幫助。馬帥行館和美大使館新指定的發言人康納士，祇是馬帥和司徒大使日常生活的報告員。美國人是聰明的，與其說協助中國，還不是協助他自己！美國人知道，中國人也知道。倒是加拿大大使歐德倫將軍爽快。他是一個標準軍人。每逢同人談中加問題，他便說：我來華是幫助中國；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加拿大自己！爲人慷慨，坦白。所以最贏得外交界人士的敬仰。不過話得說回來，也許中國和加拿大的外交關係，不過僅是一些經濟的關係，加拿大又無其他的野心，與他人無爭。

彼得羅夫是神氣十足。小汽車前有「U S S R」的紅牌子，和一幅有小鋤頭的紅旗，使路人如見馬歇爾將軍的五星牌和五星小旗，有另外的一種感覺。會屢訪王世杰，表示對國共的

談判，他要過問了。從葛米羅柯在安全理事會指責美軍駐華引起國際的磨擦，史達林率直地告訴記者美軍駐華有礙世界和平，這委實給南京首長一個刺激。司徒雷登給記者們開昏了，他連說不願談論。南京的有關當局也不曉得如何應付。連日美蘇使館來往頻頻，眼看來，以後彼得羅夫在南京的外交圈將要大顯身手了。

在南京的大使，公使，代辦，着實不少。像挪威的奧爾，墨西哥的易斯克瀾，可是靜靜地躲在一角，連名字也陌生得很。去年九月十六日那天墨西哥國慶，易斯克瀾大使全副戎裝在國際聯歡社以鷄尾酒會招待嘉賓，到會的人不少，但都等於老朋友在茶館裏碰頭，到頭來易大使同他的太太冷清清地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會未終，客人已紛紛辭去。相反地，美大使館舉行酒會，蘇大使館舉行酒會，熱鬧的情況使人感到一切都以主人為中心。外交的集會正表示國際間的勢利，這世界就是充滿的祇有利和害！

說到南京的外交圈，誰也不會忘記李駿司長。這位外交部的禮賓司長，甚覺外賓蒞臨，他得去歡迎，去陪客，這種「迎送」的生活不知他感到怎樣。也許在李司長這種生活裏，就是南京外交圈裏的哲學！

飛虎隊「創業」內幕

我國空軍的歷史很短，在抗戰前組織很小，設備很簡陋，因此對敵作戰時感捉襟見肘。民

國三十一春，緬甸失守，我唯一的國際接濟路線——滇緬路被切斷，我空軍之必需配備缺乏補充，更陷於無法應戰之狀態中。最高統帥派航委會副主任毛邦初先生去美國選購飛機，以加強我國空軍力量，並以對抗日寇零式飛機。敵零式機之速度，非常快速，我機常感無法應付，自第一次蘭州與第二次成都之大失敗，我空軍一聞警報，無不相顧失色，當局不得已採取一種不是辦法的辦法，規定：如聞敵機來襲，我機即四散向西康萬山叢中飛去逃避；而敵機來襲時的時間常常很長，我機每有因汽油用罄而失事，刺激我飛行員極度的憤恨，多願效卵敵石，情願與敵機死拚，不願逃避。這當然是太重意氣，決不是合理的辦法，所以最高當局決定向美國購買新式飛機。毛氏負了這個使命到美國，去後却是空手而回。毛氏在紀念周上報告去美購機經過，他說他已採用過任何方法，除了沒有向美當局下跪，始終未能獲得一機，詞未畢而淚湧下，參會者皆悽然。

宋美齡先生時為航委會委員，對此問題頗感煩悶，她偶然想到前次去美時，曾與陶格拉斯飛機廠試飛部主任陳納德談過一次話，認為在他身上可以獲得一些線索，她馬上寫一封信給陳納德說：「你如何可以幫助我？」陳回信說：陶格拉斯廠有一種P-51式飛機，它的速度可超過日本的零式，零式機只顧到他的速率而將機身裝甲非常單薄，容易受傷，這是零式的大缺點，P-51却沒有這個缺點，制勝可操左券。這個消息被日寇知道了，在敵飛行雜誌上登出了一篇文章，說P-51的性能遠不及零式。而且P-51還有一種毛病就是升高速不隱。我空軍當局對P-51性能本來不明白，而對敵零式却領教過多次，因此發生猶疑。陳納德原是一位很有經驗的推銷員

，他似乎知道這種心理，他向航委會委員宋美齡建議說：請你們不要猜疑，我可以做一下子廣告，貨色好不好當場試驗，飛機與汽油全部由陶格拉斯廠免費供給。由陳納德本人率領該廠試飛員數人到中國來，一切費用完全自理，如有損失傷亡，亦不必由中國政府負責，惟雙方約定，每擊落敵機一架，由中國政府付給陳方美金十萬元，如中國政府對之認為滿意時，再談買賣交易。

那時美日尙未宣戰，陳氏皆以志願名義出現，這個志願隊定名為飛虎隊，由陳自任隊長，並請宋美齡為名譽隊長，駐紮在昆明。當時我國財政很困難，能够不化一文錢得一支强有力的新空軍，又何樂而不為呢？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零式飛機十二架來襲昆明了，其目的當然是來尋D.C.的。陳納德立即命飛虎隊隊員各駕機升空迎戰，結果擊落敵機十一架，剩餘一架被逃走了，衆隊員窮追無着，陳納德大呼倒霉，「損失十萬元美金」不止。如此，每次敵機來襲，總給他殺得片甲不留。飛虎隊隊員每聞警報，無不喜形於色，蓋大家可以麥克麥克也。隊員如有未被派升空迎敵者，必與隊長陳納德大吵大鬧，說「你太欺侮我，你使我 Lost Money」，因爲不去參戰，就分不到錢。

自從飛虎隊在昆明成立後，昆明的老百姓就不逃避警報了，一切均照平時一樣，因爲大家都相信D.C.一定可以把來犯的零式敵機擊落或打跑。警報一拉，舞場和酒吧的老板，更忙得手舞足蹈，笑口大開；舞女與女招待們擦粉抹脂，等候「天使」們的降臨，「頂好！頂好！」

張一張的美金票，都到了她們的袋裏。

可是好景不常，昆明一到七月，雨季來臨，就見不得敵機蹤跡。於是飛虎隊員個個鬧窮，大家喊着「沒有生意！」吵着要回國去。舞場酒吧間裏鴉雀無聲，老板坐着打呵欠，打算關門大吉。陳納德着了急，不得不要求當局移駐衡陽。否則在昆明敵機不來，勢必坐吃山空。後經當局批准了，陳和隊員們大家重復笑逐顏開，同聲喊着「生意又可興隆！」陳納德恐怕敵人不知道，不能馬上有敵機來，他還想了一個巧妙的方法，將「中國空軍主力轉移衡陽」的消息，轉送給敵人知道，逗引敵機來襲。

後來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飛虎隊在中國已建立了殊勳，美國軍部於是把飛虎隊正式編入美國空軍，其番號定為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也被破例給予少將的銜頭。

于右任由紅變黑

于右任院長在民國初年，是國民黨中的活躍份子，如今却是元老的身份了。論目前政治上的力量，于已不及居正和戴季陶院長，可是，蔣主席對他非常尊敬。有一次，蔣主席到他公館裏去問候，走下石階時，看到石階下有二顆石子，他立即呼叱于的副官說：「怎樣不當心，于先生年紀大了，不要給石子碰了。」可見蔣主席是如何尊敬元老了。

于被蔣主席所重視，在民國十八年，那時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未久，基礎不穩，于想回陝西

，于的舊部楊虎城，正秣馬厲兵，躍躍欲試。蔣主席自然不願于回陝西，以免另生枝節，派了邵力子先生去疏通，時間非常急促，邵奉派到了于公館時，于已將整裝待發，行李堆在天井裏，送行的人會集在客廳裏，亂烘烘地，邵見事情已經如此，也不便再來勸駕，勸也無效的了，他一走入門，便說：「真的走了嗎？走的如此快，來不及送行了，什麼時候回來？」「沒有一定，南京我住下去，也不適宜。」這是于的答復，語氣間仍然有些意氣未消。邵先生不作聲，遂即打一個電話給蔣主席的隨從副官，他在電話中說：「于先生決定走了，報告一聲主席，我不回來了，要送他上車。」這些話，好像邵先生在請假。大家吃了中飯，便動身了，邵和于走出大門，邵對于說：「你坐我的車子吧，你的車子，送行人多，恐怕坐不下，我們在車內，還可以隨便談談。」

於是，于便坐了邵的汽車，隨着送行的人，足有三輛汽車，邵的車子到了三元巷口（蔣時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總司令部設在三元巷）邵對汽車夫說：「開總司令部」。又回頭對于說：「走過這兒，順便灣灣。」又囑咐汽車夫，跟在後面的三輛汽車，直開下關火車站，在車站等候。

于未及表示可否，車子開入總司令部了。這樣，于蔣作了一次重要會談，當時談了些什麼，外間無從知道，然而有二點，可以看出他的重要；第一、于進總司令部的時間，大約在下午一點鐘左右，他晚上九點鐘才出總司令部到下關車站，送行的人，在車站足足等了八個鐘頭，火車已經奉命掛上一節花車，升火待發，好容易于先生來了，蔣主席偕行，且行且談，狀甚

親熱，邵子力先生跟在後面，微笑着。在邵先生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于蔣之間已有協商，果然，于院長回陝不久，便回南京，一直在中樞担任要職。

西安事變前，于院長在南京，一向以西北領袖自居，他人也以西北領袖目之，這個「西北」，至少包括陝西政治舞台上的角兒。在西安事變前，以為陝西有什麼動作，于院長終是有辦法的。西安事變的主要角色，為張學良與楊虎城。張學良那時為剿匪總司令，而楊虎城與國民黨歷史較深，並且為陝西軍隊土著首領。擁有地方勢力，如果他不同意或者出而阻梗，則西安事變萬萬不要發生，即使發生，也可以使張學良孤掌難鳴，事情極易解決。後來證實了張較楊還要難弄。於是，中樞不能不把希望寄託在于院長的身上。論關係，楊為于之舊部，楊之見重於中樞，由於于之力薦，平日楊對于恭敬備至，論情勢，于為中樞負責人，排難解紛，自然責無旁貸。於是，臨行前發一電給楊，以為試探，電文很簡單，只有「擬即來陝」幾個字，豈知楊以「不必來」復之。於是于院長不敢飛陝，在政治上講話力量，遂減輕不少，迄至今日，情勢未變。但是，于院長對於黨的貢獻，却是不可磨滅的。

江亢虎和他的黨

由平空運到京的一批大漢奸，近已陸續由京高等法院分別審理，其中汪記偽政府考試院長江亢虎，亦於去年（三十五年）十月六日判處無期徒刑，居然免其一死，在他個人，總算是以

天之幸了。

綜江逆的平生，實在是一個熱中名利的小人，祇是他命途多乖，官運欠通，年過半百，並未到手一官半職，一直到民國二十九年汪記偽府在京成立，號召各黨各派參加和運，這時他才以久已湮沒無聞的中國社會黨，亦即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資格，混到一個偽考試院副院長，後來偽院長王揖唐調主華北政務委員會，他才算扶了正。僅僅過了四年半的官癮，就他個人講，雖說是走了老運，然而亦可憐得很。

當民國建立，帝制剛被推翻，各方都在憧憬於政黨政治，這時正是他黨魁夢開始，乃乘勢組織「社會黨」，以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號召，那時皇帝制剛下台，袁世凱正想創業垂統，一個國民黨已使他頭痛，何能容許你再來宣傳什麼社會主義，結果就被袁氏下令解散了，說這是洪水猛獸的邪說，並且還咬文嚼字說是：江，洪水也；虎，猛獸也。對他個人，則予以拿辦。以組黨被當局解散拿辦，在他個人，到是足以自豪的事，而無形抬高了他的身價。

可是，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不是「安那其」，不是「鮑雪維克」，不是「基爾特」，也不是「*anarchism*」。據內行人談：他的社會主義實在够不上稱主義，只是一些社會政策罷了。那時有一位真真的安那其主義（一作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劉師復，把他的言論駁斥得體無完膚，後來師復還將那些文字收集一起，刊印了一部叫「伏虎集」。所以有人說：當時使他不能立腳的不是袁世凱，而是劉師復。

組織既遭解散，學說又被人斥得半文不值，當然國內不能容身，乃不得不出洋遊歷，實則

當時是拿辦未着而被通緝，那祇好亡命海外了，這是第一次政治投資的失敗。

他在歐美住了八九年，究竟做些甚麼呢？據說那時由清室某王公接頭，專替溥儀等作古董販客，弄點外快。他會與溥儀通信，居然還自稱爲臣。讀者當還記得，有一年溥儀被逐出清宮後，清查宮內文物，即會發現他稱臣的親筆信件，鬧動一時。

民國十一年左右，他回國了，當然還不忘情於黨，還想完成他黨魁的好夢，這次他是捨棄了北平（當時政府尙在北平）而在上海爲根據，先在公共租界（似乎舊麥根路舢板廠橋附近）辦了一個南方大學，同時另組一「自勵會」以吸收份子，作爲組黨的梯階。隔了兩年，便宣告成了「社會民主黨」，倡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他個人則到處演講，歷經長沙、南昌、濟南等處，大有席不暇暖之勢，頗受地方當軸的歡迎，一時鋒頭之健，得未曾有。不過濟南去見張宗昌時，却未交數語即被端茶送客，張對他說的兩句話，真有點妙，他說：「先生的主義太多了，我實在弄不清楚！」張長脚真可謂腹智多靈。

以這次的情勢而論，本可以有點成就，豈料霹靂來自晴空，馮玉祥於十三日驅逐溥儀，接收清室時，把他稱臣的文件，被發覺公表了出來，這一下可糟了，黨魁的人格破產，黨的生命當然完了，於是又不得不走三十六着的上着了，他的去處，自然還是海外，這是他又一次的政治投資的失敗。

後來，他便在加拿大紀默大學担任漢學教授，兼主圖書館事，直到「九一八」「一二八」諸役之後，國內的政情變了，好在國人又大多是健忘的，於是他又動了鄉思，於二十二年又重

回了上海。

這次他的花樣變換了，不再抄從前的老文章了，黨的事既厄於情勢，祇有放棄不談了，於是乃披上外衣，以博士的頭銜從事講學，於是便有在文廟按期講經，清涼寺教文（那時他住清涼寺，名其居曰匡廬）並又假座新新公司，售聽講券說文化等幾套把戲，又組織所謂「存文會」，一時聞人多被邀入，可是，已餒之鬼無靈，沾泥之絮不起，終於號召不起來什麼人。同時，曹聚仁、徐懋庸所辦的「芒種」月刊，對他明槍暗劍，大施攻擊，也使他難堪。

接着他便去旅行緞、晉、冀、察，那時正是鶴王兩自治的時候，後又旅行到福建，又遇着人民政府的狂潮，他是否有心去投機，當然不能武斷，不過二十四年他觀光首都，却因闖案嫌疑被衛戍司令部逮拘了十幾天，還是汪精衛爲之緩頰得釋。後來他復去華北，那時華北已有些特殊化，一度傳說他往依冀東殷汝耕，但報章並未證實，此後抗戰發生，他的蹤跡也無人注意了。

他的外形很魁梧，一個龐然大物，面部輪廓肥碩，一付深度的近視眼，說起話來滔滔而極快，作他演講紀錄的人，筆頭不敏捷是要「脫班」的。她是安徽旌德人，但他有時也稱江西弋陽人，是清末科舉出身，曾留學日本、比利時、美利堅，曾任京師大學堂教席，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校長，南方大學校長，加拿大默紀大學教授等職。蘇聯十月革命後，他也曾以中國的社會黨領袖的身份，去蘇考察一番，所著有「新俄遊記」「南遊回想記」等書，他與汪精衛同庚，今年是六十四歲了。

上海總工會改選的曲折

上海總工會在三十五年九月十日方始正式改選成立，在以前是稱爲「總工會整理委員會」的。整理委員指定九人，都是戰前總工會的老人馬，像朱學範、周學湘、水雲祥、葉翔翹等，爲什麼其他全市性的人民團體像市商會等早已改選成立，而總工會遲遲未行，直等到整理了一年多以後，方始改選成立呢？這裏面有幾個道理：

一、一年以來，上海工潮洶湧，工人運動隨之開展，據社會局的統計已有工會三百二十個之多，其他尚有被認爲不合法的很多工會尙未統計在內，這許多工會，自然份子復雜，政治態度的分歧也很大。只要回憶到二、三個月以前，工人中間的「反內戰」和「反內亂」的分歧，就可想見了。如果改選得早，總工會裏面選上幾個甚至很多不穩份子，把這塊總工會的招牌，發幾個「反內戰」「要求民主」等等通電，豈非大鬧笑話，因此，一切要佈置妥當，要保證總工會裏面個個都是可靠的忠實同志，方始可以改選成立，否則寧可拖下去。

二、戰前總工會的老前輩，大部份是改選前的整理委員，改選時憑着他們的資格和地位，當選是可以沒有問題的。但是老前輩中間經過漫長的抗戰已發生一些變化，其中最使當局頭痛的是朱學範氏。朱是勞協理事長又是上海總工會整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自較場口事件以來，直到最近的勞協接收事件，朱所領導的勞協始終與當局處於不融洽的地位。以朱氏聲望之隆與

地位之高，再加上國際工會的支持和國內工會的擁護，（現在擁護朱的除他自己戰前的舊班底以外，再加上解放區的工會和一般非常局控制的工會）如果經過正常選舉手續，他是準能選上總工會理事長的。要是這樣，總工會就和勞協一體，要是在總工會的領導之下，再做一些「越軌」的舉動，那該誰負其責呢？另一方面說，如果這樣，再也不能像重慶勞協接收事件那樣運用總工會機構來對抗勞協了！這的確教費當局一番躊躇，對朱也的確用了一番手段，由打而拉，由拉而打，由硬而軟，由軟而硬。最後下了決定，無論如何不能給他當理事長，同時也給他一些面子，當個監事不能起作用算了。

三、戰後新起的幹部着實不少，其中固然有不少的忠實同志，但也有不少是來歷不明的，須要相當時期來加以考驗，以便選拔真才，掌握總工會大計。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顧念到改選後總工會的全市代表性和領導能力，不能讓總工會成爲一個只有上層沒有下層的空洞領導機構，被全上海各工會看不上眼，又要讓總工會站在人民團體的立場來擁護國策，這需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考慮和抉擇的。

於是，一切照預定計劃進行，入選人名單是預先讓出場選舉的代表們事先過目的，計選出理事二十五人，候補理事十五人，監事九人，候補監事五人，共計五十四人，全部理監事的確遍及全市各區各種工會，看起來有相當的代表全市性。朱學範氏赫然在監事名單中，讓周學湘也做了陪客，理由是：「你們都是老前輩了，讓後輩出來練練經驗，你們從旁監督指導好了！周先生也該休息休息了！」

一切照預先計劃進行，理事互推常委理事七人，開會時由社會部陸司長親自出席致訓，並親自提名征求大家通過七人名單，這樣，上海市總工會在九月十日正式改選成立了。

中大教授的派系與鬥爭

提起國立中央大學來，令人想到一匹雍腫的駱駝。的確，就組織編制上說，就現有教職員人數與學生人數說，中大無疑的應該站在中國最高學府的首席。背着中大招牌的，掛着中大徽章的，以及倚靠中大來吃飯養活一家的，甚至形成『中大系統』的政治派別的，真是洋洋大觀。最近幾年來，中大換了好幾任校長。自羅家倫下台，換了顧孟餘；不久顧氏去職，最高當局自兼校長，由教務長朱經農處理校務；不及一年多，朱升調教部次長，由原教次顧毓琇任校長；又不及一年多，願調任上海教育局長，由吳有訓任校長，至今恰好一年了。中國是個講人情面子的國度，即使出洋吃過外國麵包的高等華人如大學校長者，也在所不免吧？於是，每當校長更換的交替時間，人事異動的速率就加快起來。結果是你添幾個，他聘幾員，不管名額如何，弄得老太婆吃香蕉，有進勿出。詳細分析一下，中大教職員各有派別，彼此不相上下，雖然明裏謀堂飯廳相見，一笑嫣然，而暗裏免不了互相傾軋，劍拔弩張。最顯著的，中大教職員有三個派別：

(一) 中大派。這是包括中大前身的南高和東南，以及中央大學成立以後的畢業者羣，不

消說，這一派勢力最雄厚，旗幟也最顯明。他們曾經公然喊出「中大管理中大」的口號，其勃勃的野心可以想見。但是，這一派有很大的缺點，即他們之間的認識和步調並不一致，「南高」和「東南」出身的教授們，儼然以中大的地主自居，對於後輩的「中大」畢業生，簡直視同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而後輩的留校服務的中大校友，對於這班唱唱生鏽了的留聲唱片的老先生們，頭上迂腐頑固，簡直嗤之以鼻！南高和東南出身的一系，如孫光遠、張江樹、張士一等，口口聲聲是「年資第一」，「服務至上」，（現任校長吳有訓，系出南高。）當然三句不離本行，都是爲自己打氣罷了。至於中大少壯派，到底領袖是誰？言人人殊。現任教次的杭立武，會以中大老大哥自命，但他聲望有餘，資望不足，因爲中大畢業同學錄中，當過次長的不止他一個，何況同學中有魄力有手腕的人物，實際上並不少呢。不過，元老派已經日落西山，暮境堪傷，未來的「中大系」，只有期待於毛頭小子了。

（二）清華派。這一派來頭也不少，都是筆挺西裝，洋派十足的司麥脫人物，分佔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的大部份主要講席。本來，清華派在中大不怎麼出風頭，一直到顧毓琇出長中大，這纔惹人注目起來。顧氏爲人圓轉機警，敏捷周到，但他器識不及羅家倫，氣魄不及顧孟餘，加以接任在最高領袖蔣校長之後，所以，一時聲勢號召也不甚起色，風雨波濤也不易撐架。不過，總算慘澹經營，渡過危關。一年中建樹平平。譽毀參半。清華系的優秀人物，如樓光來、周承鎰、陳章、柳無忌等，有第一流的學術修養，對於政治活動從不過問，因此甚得大部份學生的愛戴。總之，「清華派」是中大的主要根脈，中大少不了它來撐撐台子

，沒有清華人物的中央大學，是不可想像的。

(三) 北大派。這一派在羅家倫和顧孟餘時代，是相當活躍的，因為羅、顧都是北大的淵源人物。據說：羅家倫所以當中大校長七八年，即是爲了善於利用這鼎足而立的三系勢力的矛盾與均衡。畢竟北大出身者是懂得政治玩意的，好容易撐持了這樣久的時間。往後爲了某系要將政治勢力打入中大系統，首先向羅豬頭（外號）開炮！羅氏之力對內有餘，對外不足，如何招架得住？但中大畢竟非同小可，所以顧孟餘縱其後，只是一個轉變的萌芽，中大已開始蛻變了。它要變成國民黨培養政治幹部的大本營，作爲現存北大領袖的顧孟餘，眼見得斜刺裏殺出一彪人馬，情知不妙，毅然掛冠而去。從此北大出身者在中大便有零落之感！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系主任伍椒，北大出身，與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誼屬聯襟，楊晦，吳組湘均係該系教授，近以故離職，可見以「兼容並包」聞名的北大「貫作風，施之於中大，在目前已有修改的必要了。

中大現任校長吳有訓，是中大校友，無籍籍名，但聽說他是中大校友中在學術上最有成績的一個。原任清華大學的理學院院長，研究的是物理學。前任校長顧毓琇的去職，是在朱家驊長教育部不久以後。朱氏是留德的，與留美派不大洽協，因此中大留德教授中有戈定邦其人者，活動甚力。此君係中大出身，以校友會核心代表資格施展渾身解數，加壓中大派與清華派之磨擦，當顧氏堅決表示辭職時，教部苦於無適當中大校長人選，終於由中大校友會通過提出吳氏長校，認爲適合而發表。事後，吳氏感恩知己，即以柏溪分校主任一職予戈某，作爲酬報。

關於中大編制，教部會令飭調整，主要者爲醫學院暨附屬醫院之縮減，與師範學院各科系

之裁併。醫學院及附屬學院遠在成都。規模龐大，院長戚壽南，是國內醫肺聖手，聽說：陳果夫先生的病是他診療好的，牌頭不小。目前，醫學院正鬧着獨立的問題，可能與中央大學脫羈。至於師範學院於裁併時，科系重復（如文學院之中文系與師範學院之國文系，外文系與英語系等是）者互爭系主任，各系員額限制，教職員惴惴自危，被解聘者大發牢騷！師範學院是中大最陳舊的雜貨攤，教授以中大元老派佔多數，經裁併後僅存教育、藝術、體育三系。上學期被解聘之一的林本，原隸師院公訓系主任，日本留學生，後併充法律系教授。這學期不知爲何被解聘，想來軸心名目已亡，所以德日一系也就分家了吧？

倒李運動內幕

我國貪官污吏之充塞，只要從幾省民衆對於省政的不滿就可看出大略，因爲中國人民生性馴和，不到山窮水盡，決不輕易有激烈行爲出現，但年來倒閻（錫山）運動受山西民衆一致贊同，倒劉（文輝）運動雖遭猛力壓制，也仍在方興未艾。而綿延久，波折最大的安徽人倒李（品仙）運動，幾年以來，亦無日不在積極進行之中，只可惜的是倒今天爲止，所得的成果仍是一個「零」。

倒李運動首次發動是在重慶，那一次李品仙氏已經岌岌可危了，除了有他的一批親信先到重慶和他張羅佈置外，他本人也到了重慶，但後來他却又安安穩穩的回去了。這原因，是皖北

的共匪在那時發動了攻勢，安徽的駐軍是廣西部隊，全是李的部下，安徽既有共匪，當然換不了他，難怪有人說李品仙的政治資本是軍隊了。但是，安徽人可受不住他的煎熬，在李品仙的德政下，安徽人不是逃出安徽省境，就是紛紛抱着忿恨奔向別處去了。

在重慶時所發動的倒李運動，主持者很多，并無所謂首腦人物，凌鐵庵那時也僅是主持者之一，但演變到今日，凌鐵庵變為在南京主持全部倒李運動的首腦，自有其幕後原因的，因為倒李運動的作用並不單純，李品仙是廣西派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人，尤其是白崇禧和李更親近，但這却和黨之間有了利害衝突，在重慶時的倒李運動，黨的份子參加的不少，這也就是說，有不少人是想借倒李運動升官發財，更有的人是根本有想取李之地位而代之的野心才主持倒李運動的，但凌鐵庵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了，一個同盟會及中華革命黨的老黨人，爲了當年的革命，瞎掉了兩個眼睛，天生一付倔強的脾氣，平常甯靜淡泊，一到不可再忍的關頭，青年時的熱血遂又復活，誠如馮玉祥說他的：「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不爲名，不爲利，倒李就是乾脆的倒李，絕無副作用，更不怕強力的壓制，因爲他有正義，也有地位，所以每次倒李運動失敗，淘汰了好多渣滓，疾風勁草，到今天爲止，安徽人就一致站到凌鐵庵的旗幟之下，擁起他來，組織成了「倒李救鄉會」，把南京洞庭路十號凌寓做了大本營，決定和李品仙誓不兩立，救安徽水深火熱的三百萬人民。

安徽並不乏有權勢的人，張治中，馮玉祥，柏烈武，吳忠，方治，邵華，程訪先等都是，但有的礙於「情面」，有的被人疑懼，而如今被擁戴的却是一個當年從事革命，現在息隱園林

；傷心國是的雙目失明的老人，他兩眼漆黑，滿耳聽到的又是憤怒怨詈的種種事實，如今，一批批安徽籍的大學生，常常和他盤桓在一起，討論種種事務，他有閱歷，有才學，有眼光，有亮節，在他旗幟下的人們有幹勁，有熱情，倒李運動是應該有成果的，但就在這一點上已經是安徽人的恥辱，也是安徽人的悲哀了。

在南京我見到過凌鐵庵兩次，一次在安徽同鄉會招待參政員的茶會上，聽到他的滯博激昂的演說；另一次是在他的家裏，他的女公子很多，每天讀報給他聽，他每天聽三份報，一份大公，一份文匯，二份南京中央日報，這樣，他的思想和一切，都不但不落伍，反令人感到驚異的欽佩，他的雙目失明已經十多年了，失明的原因據說是和張作霖作戰時，被困危城，日夜不眠，以致受了傷害，但如今在她女公子的掖扶下，他行動自如，身體也健，出外行走並不算一回事。

革命前後，他做過交通部航政司長，孫總理元帥府大本營中將高參，東北路局會辦，國史館纂修，皖軍討袁軍參謀長，但他雖是革命元老，却並非中委，這原因是他只有同盟會如中華革命的黨人；他在中華革命黨變成中國國民黨後並未久黨。

他現在南京，借住着親戚的房屋，但他說：「李品仙一天不走，我一夭不回安徽。」如果他有什麼關係的，但各人的作風不同，他說：「我一生耿直，現在也能溫飽，子女都能獨立，唯一的願望，是希望看到安徽康樂的建設起來而已。」

他說：誰去過安徽，誰一定有着深沉的憤怒，安徽省政亟應改良，安徽主席也應該讓賢了，報載有人在調解倒李運動的糾紛，但凌鐵庵這耿直的老人，是不會屈服的，在無數安徽人的擁戴下，他將站立得更堅強！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張君勳先生領導的「民主社會黨」，原係由戰前的「國家社會黨」，與一在海外未經應名的「民主憲政黨」，於前年合併宣佈改稱，他的前身自然還是「國家社會黨」，所以我們應該先從國社黨談起。

國社黨的組織是在九一八（民國二十年）之後，那時國際上正是希特勒的國社黨大為活躍時期，大家對於這國貨的國社黨，尚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過當時相傳他們多少與北方軍人有些聯絡而已。直到二十一年五月，他們的機關雜誌「再生」半月刊問世，這才露出面目來，當時他們的主張是「全民政治」，反對當時的「訓政」，這與當時政府立場自不免衝突，因此並未能過份明目張胆的活動。

這情形一直到抗戰發生後，政府放棄一黨專政，邀請各黨各派參加政府，一致團結禦侮，籌組民意機關的參政會，來共同負責抗戰大任，這才彼此默認，於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與當時國家主義派演進的青年黨分別以書面向國民黨蔣、汪兩氏投書，說明他們的主張與中山先生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要義，措辭容有不同，而精神初無二致；並認為政府態度，與在野黨所要求，不謀而合，所以自當開心見誠，公開予以說明云云。隨即於四月十七日由蔣、汪兩氏聯名覆書，正式承認國社與青年兩黨為在野政黨。（原書具載當時各日報）

假使我們要進一步研究他的過去情形，還可以替他慎終追遠的，上溯到清末戊戌變法的康梁。張君勳與張東蓀，都是梁氏的得意人物，尤其對君勳，認為是可以傳他衣鉢的。

康梁的維新黨，當時是與國父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對立的，民元冬，梁啓超先生歸自東瀛，會另創一「民主黨」，次年五月，民主黨又與當時的「共和黨」及「統一黨」合組為「進步黨」，由黎元洪、梁啓超、湯化龍、王揖唐、孫武、蒲殿英，王印川等任理事，仍是一脈相承，與國民黨對立着。

後來南北政府對峙，進步黨在會中分裂為「憲法討論會」與「憲法研究會」，研究會的幹部人物，便是梁啓超、熊希齡、汪大燮、林長民、范源濂、蔣百里、張一麐、藍公武、蒲殿英、王家襄、徐佛蘇、劉崇佑等，這就是世稱的研究系，而張君勳與東蓀均是系中的幹事之一。

當民八五四運動後，研究系在文化方面確會努力過一番，功不可沒。當時他們在北平辦有「北京晨報」，「時事月刊」；在上海辦「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月刊，時張君勳在吳淞主辦「自治學院」，張東蓀在滬主筆時事新報，君勳與東蓀同姓同庚而不同字，君勳江蘇寶山人，東蓀浙江杭縣人，他們一直是在一起的，直到去年因參加國大，張東蓀才脫離了民社黨。

但據傳二張的私交，仍維持原狀。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李品仙先生自抗戰以後，由十一集團軍司令，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唐生智自任南京衛戍司令之後，從此湮滅無聞，但他兩人的關係，益加親密起來。李與唐原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北伐以前，李一向在唐的部下做事。北伐時，唐之出湘，連戰皆捷，直搗開封，都是李的功勞爲最多。後來唐在政治上失敗，李的部屬，才歸由白崇禧將軍指揮。但李之對唐，仍以長官看待，處處以部屬禮對之。抗戰以後，李以十一集團軍職務，駐節蚌埠徐州，唐任南京臨時司令官，那時上海戰事剛敗下來，南京已無兵可用，無險可守，唐之出山，也是受任於危難之間，準備犧牲殉國的。白崇禧將軍過蚌埠到徐州，對李品仙說：「孟藩（唐生智號）這次很危險，一切後事，又是你的責任了」。李品仙當時很爲憮然。第二天他派輕兵一營，祕密的開駐浦口，過了四天，唐生智就發生南京突圍之變，李品仙早已預備一營輕兵，就把他護送到徐州。

抗戰的幾年中，唐在重慶相當清苦，李品仙在大別山身兼五六要職，他把他每月的薪給所得，寄給唐孟藩一半，每逢年節，又特別送節禮，唐生智向人表示，一生革命，每次失敗，祇有一件事沒有失敗，就是交到了李品仙這個朋友。

民國三十三年，安徽省參政員選舉，除掉中央指定者外，本省選出者，祇有四名，皖人角

逐者，在五十名以上。每人找中央要人之推薦電報，不下數十封，李品仙均置之不理。在選舉的前三天，唐生智介紹一位劉啓端，請李促成，而劉啓端與省參議員。又特別生疏。李品仙相當爲難。後來，他親自拜訪參議會長江彤侯，說明一切選舉，他都不參加意見，惟孟公介紹的劉啓瑞，他必須促成。中央任何人的電報，他都可不理，祇有孟公的電報，他爲公爲私，爲道義所齒，不得不服從。江氏把此意向各參議員說明，大家才一致捧場，啓瑞之參政員遂一舉成功。後來，啓瑞打電報來謝他的厚意，他拿着電報對人說：「先生應謝謝唐孟公，我是服從孟公的命令的！」